

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後領導制度的轉型 （1923-1924）

王良卿

摘 要

在中國國民黨縣互百餘年的革命、黨治、民主化進程中，自1924年一大全會閉幕後的1年期間，既是孫中山人身權威角色烙印在治黨模式裡的最後階段，也是俄共委員會體制經由人為導入而形成改組重要內容乃至嶄新治黨機轉的最初積累階段，兩種經驗共同交會，驗諸運轉動態，實際上在領導制度層面具有混合形式的重要轉型效果。本文運用一手、多元史料，提出「複層權力空間」的理解方式，旨在說明：一、黨內各方在新總章原擬委員合議的領導、組織框架下，如何基於各自的現實需要與情境制約，因而借用孫中山的人治權威，透過總理專章的設置，進一步與中央執行委員會建立一種訓育／被訓育、但具有共構共轉特徵的法制地位。二、針對孫中山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黨務運作中的權力行使及對應關係，進行一種實證的、多面向的互動考察，一方面有助於理解國民黨領導制度的轉型，誠不止是制度層面的形式化變革，也與聯俄容共的實際政治進程互為表裡；另一方面也有機會充當我們進一步理解孫中山晚年乃至國民黨後孫時代政治的知識基礎。

關鍵字：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改組、孫中山、鮑羅廷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Kuomintang's Leadership System in the Reorganization Period, 1923-1924

Liang-ching Wang^{*}

Abstract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Kuomintang (KMT) in 1924 for a stratified power structure giving the privileges to both Sun Yat-sen and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was the very maj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ty's internal leadership system. This study shows the decision by the Party's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to bestow special rights on Sun Yat-sen in its discussion of the drafting of the Party's Constitution, which was an effort by both the right-wing and the left-wing to seek a mutual balance of power by using Sun Yat-sen as the pivot. Also, this study develops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This approach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shift in the leadership system during the KMT's reorganization, which subsequently formed the basic component of the political dynamics in Guangzhou, and contributed to a deeper comprehension of the KMT's politics in the post-Sun era.

Keywords: Kuomintang, alliance wi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eorganization, Sun Yat-sen, Mikhail Borodi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後領導制度的轉型 (1923-1924)*

王良卿**

壹、前言

自中華革命黨時期以降，孫中山開始發展「一切軍國庶政」在革命階段「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¹ 蘊含「以黨治國」、「將黨放在國上」等精神的建國程序主張；另一方面，有感於革命運動的前車之鑑，遂將治黨方式斷然調整為「秘密時期，軍事進行時期，黨魁持權，統一切」的制度化表現，究其實際，無非就是「以身負黨」、「將身放在黨上」等使命意識的反映。² 據孫中山所言，批評者反對他「把個人做主義去辦黨」，但其痛定思痛之餘，既自認「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復以「（革命）黨本來是人治」力加辨折，乃將「服從我，就是服從我所主張的革命」之「感情作用」特別突出為「黨之能夠團結發達」的重要

* 本文受益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日／月談」講論會中的同仁討論、啟發，以及吳景平、汪朝光、李朝津、邵銘煌、劉維開、羅敏等教授在2014年「中國國民黨一大暨第一次國共合作成立9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的提問與觀點，並根據匿名審查人惠示意見修改而成，謹此一同致謝。

收稿日期：2013年9月8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年5月1日。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¹ 〈中華革命黨總章〉（1914年7月8日），收入鄒魯編，《中國國民黨史稿》（上海：民智書局，1929年），頁139。

² 〈總理覆楊漢孫論統一黨權與服從命令書〉（1915年8月4日），收入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5輯（臺中：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54年），頁45；鄒魯編，《中國國民黨史稿》，頁8。

條件。³ 及至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孫的人治言論隨著改組進程開始產生變化：一方面已視「全黨事務委一人之手」、「獨木支大廈」為以往特定時期、特定需要下的過時經驗，期待今後黨運勿因總理個人之有限生命而有所興廢，聲言要將「革命重大責任分之眾人」；⁴ 一方面，私下則仍承認「吾黨之情感至重」，實未反對黨員「尊王」主張的繼續發揮，而有兼揉俄共經驗以求等而上之的意思表示。⁵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新總章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類似的情態流變：它既全面複製了俄共委員制的基本框架，也別創了總理專章的形式，賦予孫中山訓育黨人的特權。孫晚年的治黨模式不再像以往那樣單純直白，難免形成學界莫衷一是的理解，例如即便注意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全代會閉幕後的法定最高權力機關，以下簡稱中執會）已能開展「一事一決的議事制度」，但仍相信國民黨的領導制度無異於改組之前，猶是總理的「總攬黨務」、「獨斷獨行」；⁶ 也有稱國民黨「仿效蘇俄實行委員制」，或稱「採納俄共委員制之外，兼顧總理制，……表明當時全黨都自願聽從孫中山的獨裁」，甚至有「這樣一來，實際上成為一個非驢非馬的東西，因為俄共的委員制意在分權，而國民黨的總理制重在集權，兩者兼收並蓄，實際上意味著國民黨全黨仍自願聽從孫中山獨裁」的說法。⁷

³ 居正，〈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回憶〉，收入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5輯，頁82；〈修改章程之說明〉（1920年11月4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3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216、218。

⁴ 〈在國民黨廣州市黨員大會上的演說〉（1923年11月11日），收入尚明軒、余炎光編，《雙清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579-580；徐永瑛，〈見孫中山先生記〉（1924年2月9日採訪），《近代史資料》，總68號（1988年1月），頁183；〈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11號（1924年1月25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以下簡稱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1/10。

⁵ 鄒魯編，《中國國民黨史稿》，頁412-413；鄒魯，〈回顧錄〉，第1冊（南京：獨立出版社，1947年），頁158。

⁶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241-242；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29、39。

⁷ 王奇生，〈國民黨中央委員的權力嬗變與派系競逐〉，《歷史研究》，2003年第5期（2003年10月），頁55；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頁15；王奇生，《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

類似的觀點雖都注意到委員會體制已經建立，卻又不認為其在權力行使上具有任何真實的、有意義的效果。事實上，有關國民黨領導制度一仍舊慣的論點，不啻過度低估了孫中山亟思透過改組而厚植黨基、縣延黨運的決心；至於獨斷獨行、獨裁的說法，也忽視了委員合議機制並非沒有公斷公行、公裁的自主表現。在更多時候，類似的觀察也容易流為總理特權、委員合議只能是二元斷裂、互不連動，甚至立論互反的解釋傾向。⁸ 再者，總理繼續獨裁的論點也容易讓人誤認改組後仍是一個傳統的連續，讓中執會的客觀存在淪為「伴食宰相」般的無為概念，並不容易解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怎能藉由一個幻影而迅速建立起全新的領導秩序。⁹

在國民黨縣互百餘年的革命、黨治、民主化進程中，自一大全會閉幕後的1年期間，既是孫中山人身權威角色烙印在治黨模式裡的最後階段，也是俄共委員會體制經由人為導入而形成改組的重要內容，乃至嶄新治黨機轉的最初積累階段，二者共同交會，未必能與改組前「委一人之手」的舊經驗完全一致，實際上具有混合形式的重要轉型效果。整體而言，學界對於國民黨改組的研究成果堪稱豐碩，不過領導制度的轉型問題一直沒有受到充分注意，形諸專題探索者極為少見，導致對改組前後歷史的認識呈現了相當大的罅漏。有鑑於此，本文將利用國民黨黨史館典藏檔案、國民黨與中共中央、俄共與共產國際的檔案文件彙編，以及時人言論著作、憶述文獻、報紙期刊等多元史料，針對總理與中執會的關係，提出「複層權力空間」的理解方式，說明：一、包括孫中山自己在內，黨內各方在新總章原擬委員合議的領導、組織框架下，如何基於各自的現實需要與情境制

（1924-192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38-39。

⁸ 例如學者一方面強調總理獨裁依舊，卻又相信俄國顧問鮑羅廷（Mikhail Borodin）目睹一批反對容共政策的中央委員對於中山多有掣肘和影響，乃有別立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建言，意將「中央執監委員會的權力」逐漸轉移過來。王奇生，〈中政會與國民黨最高權力的輪替（1924-1927）〉，《歷史研究》，2008年第3期（2008年6月），頁65。

⁹ 學者王正華注意到孫中山仍是唯一領袖，但也願意扶持委員制的事實，從而將改組前與後的領導特徵做出區隔，指出國民黨領導結構業已出現變化，中央幹部在黨的影響力逐漸提高，中執會由黨中同志擔負主要責任，有助於日後權力的移轉。不過她的說法缺少實證支撐，未能獲得足夠的注意。王正華，〈國民政府初創時之組織及黨政關係（民國14年7月至15年12月）〉，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7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頁126-127。

約，因而借用孫的人治權威，透過總理專章的設置，進一步與中執會建立一種訓育／被訓育、但具有共構共轉特徵的法制地位。二、複層空間的多元形成動機決定了權力行使的多元形式。本文嘗試針對「孫總理」和「委員們」在黨務運作中的權力行使及對應關係，根據一手史料，進行一種實證的、多面向的互動考察，一方面有助於理解國民黨領導制度的轉型，誠不止是制度層面的形式化變革，也與聯俄容共的實際進程互為表裡，其本身就是廣州動態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有機會充當我們進一步理解孫中山晚年乃至國民黨後孫時代政治的知識基礎。

貳、鮑羅廷計畫與改組特別會議

促請國民黨改革領導制度與組織形態，本來就是共產國際與孫中山合作所預期的核心工作之一。嚴格說來，1923年5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Henk Sneevliet, alias Maring）、陳獨秀為孫草擬的改組計畫，替這項工作開了有意義的頭。其時，孫受俄援政策明朗化的激勵，不僅表示接受俄共委員制框架的改組計畫，也開始將列寧式政黨的運作經驗和西方其他形式的合議領導制度給予區隔看待。¹⁰原則上，孫中山對一般合議領導的感受不佳。1918年，廣州軍政府改組為七總裁制，原「元首政治」倏地翻轉成「多頭政治」，孫斥其「委託不專，責任不明」。¹¹及至1920年代初期，行政委員制一時倡於中國，有以瑞士經驗為本，視

¹⁰ 馬林、陳獨秀草擬的改組計畫：“Two Drafts of a Plan for the Reorganisation of the KMT,” late-May 1923, and “Schemes for Reorganisation of the KMT, Including Budget Estimates,” late-May 1923, in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v. 2 (Leiden: E.J. Brill, 1991), 以下縮寫為OFUFC, pp. 555-564. 孫中山的正面回應：“Report on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nd Our Work in the Period 15-31 May 1923,” 31 May 1923, and “Letter from H. Sneevliet to A. Joffe, J. Davtian and G. Zinoviev,” 31 May 1923, OFUFC, v. 2, pp. 541, 544-545；瑪瑪耶娃撰，孫艷玲譯，〈共產國際與國民黨——20世紀20年代關於共產國際與國民黨相互關係的某些觀點〉，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頁89。

¹¹ 〈護法及改組軍政府絕不可犧牲法律〉（1918年4月1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2冊，頁517；〈致廣州國會辭軍政府總裁電〉（1919年8月7日），收入秦孝儀主

為弭爭更始之契機者。¹² 1923年6月，直系逼逐總統黎元洪，制憲聲急，權採行政委員制救國的論調再起，國民黨人徐謙等主張尤力；¹³ 然7月4日，孫中山函勸徐謙不要「隨俗浮沉」，聲言絕對反對「兄所倡之委員制」，「因曾飽嘗七總裁之滋味，以後再不敢領教也」，繼於函末預告廣東軍事一旦結束，「自當另為澈底革命之運動，以期收效於三年」。所謂「澈底革命之運動」，無非推重俄共的黨治、治黨經驗。¹⁴

孫中山不願認同西方合議治國的「俗」經驗，卻能接受俄共委員合議的治黨模式，其曲折背景值得觀察者至少包括：第一、俄共委員制做為莫斯科向廣州推介的革命套路之一，本身就兼蓄了合議領導的形式、自下而上遞建的嚴密組織與剛性紀律之行使的多重內涵，業已構成一個完整的制度體系，不易切割挑揀。第二、俄共委員制做為領導制度的一面，存在著形式和實際表現的分化：形式上，是委員合議，行集體領導；實際上，則革命領袖列寧（Vladimir Lenin）仍然擁有思想和行動的高度影響力。原則與制度也常視政治強人的能動性格為轉移，俄共委員制的真實運作情態和國民黨的人治傳統並非全無接榫餘地，正是孫中山樂於援用、揉合，據以重建國民黨領導制度的重要原因。¹⁵

編，《國父全集》，第5冊，頁155。

¹² 參見佐治徐謙，〈依基督救國主義擬商榷之憲法要點〉、董修甲，〈聯邦制與委員會制之研究〉，均收入《東方雜誌》，第19卷第21期（1922年11月10日），頁6（佐文）、1-3（董文）。

¹³ 〈救國聯合會對時局之表示〉，《申報》，上海，1923年5月25日，版14；陳霆銳，〈行政委員制之一先例〉，《申報》，上海，1923年6月25日，版3；陳霆銳，〈評瑞士行政委員制〉，《申報》，上海，1923年7月5日，版4；陳霆銳，〈行政委員制與中國〉，《申報》，上海，1923年7月6日，版4。

¹⁴ 〈復徐謙告不願受議員選為總統並反對委員制函〉（1923年7月4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5冊，頁459。並參見同集同冊，〈致石青陽勉繼續奮鬥函〉（1923年7月10日），頁461。關於徐謙生平，參見李雅芬，〈從翰林革命家到激進左派——徐謙的重要政治生涯（1903-1927）〉（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李文將此時徐謙提倡的行政委員制視為受蘇聯影響，說是藉此表達對「俄國工農政府的欣賞」等，似有商榷空間。事實上，徐謙此時猶未苟同蘇聯的一黨專政，也認為「共產主張，徒使人類返於原人狀態」，參見佐治徐謙，〈依基督救國主義擬商榷之憲法要點〉，頁4、8。

¹⁵ 學界頗能注意列寧身為政治強人而超越於制度之上的能動性格。前南斯拉夫學者德拉古京·列科維奇即曾提出「兩個列寧」一說，認為這位領導人在本質上雖具有原則性的理想，但在實際上往往急於擺脫困境、生硬暴躁而要求服從。王麗華，〈國外列寧研究中的

不過，其後孫中山和蘇聯在中東鐵路談判等議題上浮現不睦，和馬林、陳獨秀的關係也因為屢遭批評為沉迷軍事及「孫曹（錕）攜手」等傳言而惡化，導致馬林聯孫使命終結，改組計畫為之塵封。¹⁶ 馬林離開廣州之前，在其化名文章及寫給廖仲愷的私人信函中，都曾將國民黨員歷來效忠領袖的人治文化貶抑為俄共治黨模式作為「近世政治團體」、「現代化政黨」之模範經驗的「封建」對立面，語氣未盡假借，仍有壯志待酬的況味。¹⁷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任命鮑羅廷做為孫的政治顧問後1週，莫斯科《真理報》以「國民黨左派一位成員」為名義的幽默手法，發表了馬林的廣州文章，編者並加按語，許為「頗有價值」。¹⁸

10月6日，鮑羅廷抵達廣州。他的到來，既是莫斯科當局改善俄孫關係的具體表示，也帶有加速推動廣州工作的意圖表徵。歷來學者對於鮑羅廷之能得到莫斯科委派及孫中山信任的分析已多，大致都體現了確係「合乎邏輯人選（a logical choice）」的詮釋模式；¹⁹ 但人們常忽略的參照背景是：鮑羅廷懂得運用中國政壇的人情世故，能公開推重孫在國民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感召能力與領導地位，這和馬林語出「中國沒有國民黨，祇有孫中山黨」，及欲「肅清」家戶長制領導傳統的褊急心理截然不同。²⁰ 在廣州，孫中山立即委派鮑羅廷擔任國民

不同觀點》，《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年第6期（2005年），頁155-156。

¹⁶ 詳見李玉貞二本專著的整合分析：李玉貞，《孫中山與共產國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頁235-253；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頁191-202。

¹⁷ 孫鐸，〈中國國民運動之過去及將來〉，《前鋒》，創刊號（1923年7月1日），頁6-9；“Letter from H. Sneevliet to Liao Zhongkai,” 21 July 1923, *OFUFC*, v. 1, pp. 389-394.

¹⁸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21次會議紀錄〉（1923年8月2日），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1卷（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頁219；章任賢譯，〈簡述中國民族運動的過去和未來〉，收入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四川省中共黨史研究會編譯，《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1919-1927》，第1輯（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頁45-53，原載《真理報》，莫斯科，1923年8月9日。

¹⁹ 人們經常強調鮑羅廷擁有豐富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經驗、與包括列寧在內的眾多俄共領導人交誼甚深、與蘇聯新任駐華全權代表加拉罕私交不錯、英語嫻熟、擅於說服的技巧，以及和不同背景或政見各異的人共事的能力。“a logical choice”，語出：Dan N. Jacobs,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13.

²⁰ 例見〈文明國開化退步國〉，《嚮導》，第45期（1923年11月7日），頁348（彙刊第1集）。馬林之語，出自離穗前的文章和致廖仲愷函。

黨的組織教練員，賦予改組工程的設計師角色，也指派一些幹部與鮑深入討論，特別是著手起草鮑所繫念的黨綱和黨章。根據鮑羅廷的評價，這些幹部中以廣東省長廖仲愷、廣州市長孫科、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的態度最為積極。²¹ 在鮑的指導下，大約1個星期或再多幾天，一份改組計畫與樹狀示意圖業已擬就。其大要：

中央層級方面：第一、由國民黨全體大會選出21名委員，組成國民黨全國委員會，充當「國民黨領袖」。第一次全體大會未召集前，應成立國民黨臨時全國委員會，舉會長1人，祕書1人，每兩個月在廣州開會1次；惟會長得視需要隨時召集之。第二、由國民黨臨時全國委員會選舉9人組成執行委員會，執行臨時全委會的議決事項，並作為黨的常設執行機關。這裡所說的執行委員會約莫等同於馬林、陳獨秀計畫裡中央局的概念，規定選舉祕書1人，「與會長常通消息，受會長之訓示、指導及接收款項以資進行」，其下設各部。²²

至於地方層級，仍依循委員制的形式，在廣州、上海等國內外城市設立支部，並在黨員滿20人以上的地方設置分部。又，「國民黨現當用兵以圖中國之統一自由獨立之際」，所以黨中央將把權力延展至基層，主張「其設有支部地方之分部，應直接受支部之指導及管轄，但執行委員會仍有直接指導及管轄分部暨黨員之權」。此外，透過中央的指令，支部、分部應於各地組織國民俱樂部，吸納個人及各類團體（含職業聯合會），以「發達黨務，招攬黨員，感化群眾及有智識團體」。俱樂部內，黨員應形成「國民黨之團隊」，貫徹黨的政策、態度、方法，並詳陳俱樂部的活動情形於中央。²³

即使如此，改組計畫仍未立即擯棄孫中山在黨內的支配地位。前揭會長一職，最可能是孫行將扮演的角色，但鮑羅廷沒有規範這個職位和臨時全委會的關

²¹ 〈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報告〉（1923年12月10日），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1卷，頁303；〈吳鐵城致張繼函〉（1943年5月14日），《一般史料》，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435/241；吳鐵城，《吳鐵城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頁128。

²² 〈國民黨改組計畫〉（不早於1923年10月18日，不晚於25日），《一般史料》，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415/26。

²³ 〈國民黨改組計畫〉（不早於1923年10月18日，不晚於25日），檔號：415/26。這裡的「國民黨之團隊」即為日後一大大會黨章所列「國民黨黨團」專章的張本。

係，等於讓個人領導在委員合議框架裡預留了某種模糊的展布空間。其次，會長位階居於執委會之上，並透過祕書的承轉，等於對該委員會擁有訓示、指導和財政等權力。²⁴ 此外，改組計畫還要求國民黨在上海發行中央機關報，以會長為社長。²⁵

鮑羅廷的計畫不忘折衷地帶進孫中山的角色，然而某些資深幹部仍不容易寄託情感與信仰於斯。10月25日晚間，廖仲愷、廣東支部長鄧澤如承總理之意，假廣東省財政廳頂樓召開改組特別會議，商討「改組之必要」與「改組之計畫」二議題。到會者一百餘人。主席廖仲愷講解了改組示意圖的內涵；孫科繼起申述，指稱這份計畫「根據于俄國共產黨」。特別會議打算在改組程序啟動之前先行凝聚國民黨菁英的共識，但當廖仲愷徵詢舉座「究有異議否」時，質疑黨內領導制度變更的一方與鮑羅廷多有爭辯，兩造針鋒相對，幾乎成為當晚討論過程的唯一焦點。²⁶

反對陣營提醒眾人注意國民黨擁有自己的制度源流，例如謝英伯就直指黨魁制度在黨內的長遠歷史，黨的組織方式一直是「由總理而生總部而生支部而分部」，但俄人「由下而上」的制度反而顛倒，畢竟「與中國不同」。謝英伯曾替中華革命黨的海外黨務奔走，做過孫中山護法時期的祕書，他的第二度發言還提醒眾人留意改組計畫的會長地位「無一定保障」，暗指孫的權力恐將無著。另一位異議人陳羣，既曾變賣房產資助過中華革命黨，也在護法時期擔任過孫的祕書，他在特別會議上乾脆說道「黨中各事歸于中山先生個人便可了矣，何必再行提出」。吳榮新則堅信「本黨原有組織已甚齊備」，不能同意改組，只能主張以「淘汰不良分子」為首務的「改造」，言次甚至質問當晚會議是否根據現行章程

²⁴ 〈國民黨改組計畫〉、〈國民黨改組計畫圖式〉（不早於1923年10月18日，不晚於25日），《一般史料》，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415/26。

²⁵ 其實國民革命史上自有注重宣傳的傳統，但讓孫中山掛名主持機關刊物的例子並不常見。無可諱言，相關設計多少是和列寧一向注重機關報在共產革命中的作用，視為「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有關。頓斯科依著，俊莊譯，《蘇聯共產黨的列寧組織原則》（北京：時代出版社，1955年），頁10-12；列寧，〈從何着手？〉（1901年5月），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8。

²⁶ 〈本黨改組特別會議錄〉（1923年10月25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6188。

召開，或者根本已是一種「革命式」作為。有意思的是，批評者不明白總理的傳統權力為什麼要被一個委員會所瓜分，甚至不能理解為何要讓來日的會長去「屈就」管理黨的總機關報。²⁷

質疑者反對黨內領導制度的變更，等於連帶排斥布爾什維克組織經驗的移植。鮑羅廷即席提出兩次批駁。他並不迴避談論國民黨「以黨首為主體」的制度源流，惟認為歷來「靠黨首而不靠黨首〔員〕」，未能養成自立能力，適足以證明「數十年之錯是在于此」。鮑推崇孫中山為「本國及世界之重要人物」，聲明「本人非不贊成無〔有〕領袖」，但仍針對「本黨究如何能永遠成立」的課題往復致意：一方面強調列寧以往遇刺「而尚有人出力執政，此由於非黨首制之利也」，一方面也提到數日前陪同孫巡察虎門要塞卻遇土匪襲擊的「極危險之證」，調侃「假如無了此黨首，則黨散矣」，說「一人之力有限」，況「黨首無百年不死者乎」。²⁸ 從語意看，鮑的話倒是和中華革命黨時期一批異議者「設孫先生一旦捐賔，豈吾輩將無所附從乎」的說法相近。當時拒絕「附從」孫的「口實紛騰」，「不惟不附從，而反阻障」，黨務部門曾引為「腹心之疾」。²⁹ 必須指出，這些「附從」總理無上權威到底的黨務中堅們，而今就某種意義而言，似乎反倒被視為「阻障」的一部分了。

叁、章程草案的反響與孫的態度

10月25日的特別會議採取全場起立「一致贊成」改組的方式，維護了形式上的團結，與會者也通過孫中山特派的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名單。³⁰ 臨時中央執行委

²⁷ 〈本黨改組特別會議錄〉（1923年10月25日），檔號：漢6188。

²⁸ 〈本黨改組特別會議錄〉。關於列寧遇刺：Louis Fischer, *The Life of Leni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chap. 19；列·達·托洛茨基著，王家華、張海濱譯，《論列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頁136-142。關於孫中山遇襲：〈鮑羅庭關於華南形勢的報告〉（1923年12月10日），頁303。

²⁹ 〈中華革命黨通告〉，收入鄒魯編，《中國國民黨史稿》，頁282-284。

³⁰ 〈本黨改組特別會議錄〉（1923年10月25日），檔號：漢6188。又，蘇聯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的回憶錄擁有長期的學術影響力，但他對於改組特別會議的報導明顯錯誤：出席會議者非僅50名，孫中山其實也未到場，會議爭論的焦點更不在於臨時中央執行委員的人選問

員會直接效命於總理，擘劃、辦理改組作業；並請鮑羅廷擔任顧問，實則會務工作多賴之參綜。³¹ 值得注意的是，臨時中執會28日開議後未滿1個星期，鮑羅廷又以英文替國民黨擬就一份新章程草案，嗣付孫中山審定，廖仲愷翻譯成中文，旋提交11月5日的臨時中執會逐條完成修正。³²

實際上，這份章程草案更富有規章架構的周密感，其章次條序、內容，都和俄共在1919年12月、1922年8月通過的兩份章程貌合神似。1919年的「俄共章程」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為共產黨後的第一個黨章，具有重要的創制價值；至於1922年的章程則是修正過後的版本，惟旨趣仍然一致，架構相近。兩份章程都在相當左近的範圍內形成與「國民黨章程草案」的重疊效果，只是歷來學者追溯國民黨改組時期章程的異國源頭時，大多習慣地採取單一藍本的判斷思維，不是強調1919年版的原典地位，就是側重1922年版作為最近、最新文本的身分，³³ 極少注意到鮑羅廷曾針對俄共兩份版本的細節各有擇取的事實。³⁴ 從這個角度

題。亞·伊·切列潘諾夫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37-38。

³¹ 臨時中執委林森曾云會務「得俄人鮑君之力為多」。〈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3號（1924年1月21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1/10。

³² 綜見：〈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1923年11月5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0.1/4；〈孫中山批復鄧澤如等十一人〉（1923年12月），原蹟複印件，收入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上海：正中書局，1948年），頁301；〈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報告〉（1923年12月10日），頁303；鄭秀山等，〈鮑羅廷等在廣東〉，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編，《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頁260。

³³ 日本學者江田憲治認為鮑的草案是以1922年的俄共章程為本，中國學者王奇生則指出1922年的章程只是1919年章程的修訂版本，故應以1919年為是。江田憲治，〈一九二〇年代的民主主義——国民党と共産党を中心に〉，收入狹間直樹編，《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頁104；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頁14。

³⁴ 例如：一、「俄共章程」所定中央委員人數，由1919年版的正式委員19人、候補委員12人，修正為1922年版的交由黨代表大會決定之。「國民黨章程草案」援用的是1922年版。二、「俄共章程」1919年版規定中央委員全體會議至少每月召開兩次，1922年版則規定至少每兩個月召開一次。「國民黨章程草案」較接近1919年版。三、「俄共章程」1922年版規定中央委員會應設立由中央委員3人組成的書記處，「國民黨章程草案」借用了此一規定較為具體明晰的版本。四、「俄共章程」1919年版規定中央委員會按月分發一次活動書面報告，1922年版修正為每兩個月。「國民黨章程草案」採行1919年版。詳見〈俄國

說，則「國民黨章程草案」所描摹的對象，或可用「雙藍本」的概念重新界定；從總體的意義看，其實也是充分仿行俄共發展多年所涓滴形成的體質經驗。

1923年11月的「國民黨章程草案」具體顯示了各級執行委員會做為各級權力機關（各級代表大會或黨員大會開會期間除外）、執行機構，是依據自下而上、層層構建的原則所締造的一套金字塔型領導、組織體系。中央執行委員會位列樞紐，成員、權力來自國民黨最高機關（全國代表大會）的選舉及其閉會後的委託，對外代表國民黨，對內則組織中央各部執行黨務，指揮地方黨部及政府、俱樂部、會社、工會、商會、各級議事機關內的國民黨團隊，支配黨費、財政。值得注意的是，草案仍保留總理職位，自是俄共章程形式上之所無，規定：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本黨總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以本黨總理充之」。³⁵ 兩項條文究竟是鮑羅廷草案原有或是臨時中執會的增益，尚不得而知，然無論如何，總理做為中執會的領銜成員，當負議事主持之責，且草案和稍前的改組計畫一樣，未再界定類似個人職位和委員合議的互動關係，已有替總理之政治角色創造迴旋餘地的可能。

11月11日，廣州全市黨員大會向到場人士發送章程草案，權充領會改組旨趣和實務的一手材料。³⁶ 根據會上廖仲愷轉述總理的話，顯示孫中山願意接受，也勸導黨人接受這一套嶄新的領導、組織體制，要求同志勇於承擔。孫感嘆國民黨多年的犧牲未免與其收穫不成比例，歸根結柢說來，「不特以全黨事務委一人

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章程〉（1919年12月），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1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頁589-600；〈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章程〉（1922年8月），同書，第2分冊，頁217-229；〈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首刊於《國民黨週刊》，第1期（1923年11月25日），今引自《嚮導》，第50期（1923年12月29日），頁384-388（彙刊第1集）。又如「國民黨章程草案」原規定設置審查委員會，這是汲取自「俄共章程」1919、1922年兩個版本的檢查委員會條文；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趕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之前調整了相關內容，改設中央監察委員會，其特別參酌的是「俄共章程」1922年版新條文的精神。「主席林森報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5號（1924年1月22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1/10。

³⁵ 〈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1923年11月），頁385-386（彙刊第1集）。

³⁶ 參見〈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紀錄〉（1923年11月8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0.1/4。

之手，且以一人而供孤過，其不失敗不隕越者幾希」。他將「組織之未備」視為「本黨不進」的重要原因，自謂「總理非有碩大無朋之力」，必須仰仗「吾黨同人」培固黨基，務必催使黨員活動「一反為由下而上」，才能「了望有成」。考其深意，已與鮑羅廷在特別會議的談話神似，大有別於孫多年以來「以身負黨」的強勢言論。³⁷

同一期間，廣州做為章程草案的第一個試驗場，刻正進行「一反為由下而上」的改組操演。國民黨在當地著手布建區分部等基層組織，大為振奮了中共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的工作情緒，乃至發展成「全班落力出齊拍演」的積極表現。³⁸ 鮑羅廷認為，跨黨黨員替國民黨的改組做了大量工作。究其實際，毋寧說是也讓跨黨黨員掙得更好的機會，據以安插在國民黨下層的有利位置上。這樣一來，包括臨時中執委鄧澤如在內，一些純粹國民黨員對跨黨分子的活躍表現感到疑惑，認為他們必欲攫奪各級委員；對章程草案透過選舉程序產生總理人選，更有毀黨之懼。11月29日，廣東支部長鄧澤如等11人聯名函呈孫中山，彈劾跨黨分子，反映了一批具有資本主義國家與東南亞殖民地地緣關係的老同志對於黨基丕變的憂慮。鄧澤如深知改組事務係由鮑羅廷主導，遂將矛頭指向「外人」陳獨秀「弄我如傀儡」，章程草案「定總理一職為選舉職，竊恐事實隨環境變遷，五年之後，將見陳獨秀被選為總理矣」，果然，則「辱及全黨，我黨無形消滅」；再者，國民黨人事「向用委任之制，各局部首領之智愚賢不肖，由總理審定而別擇之以大公無我之心，自收用當其材之效」，但廣州刻正進行的區分部委員選舉，只見「陳獨秀黨徒」積極介入，大有躡進之勢，則省級與中央的執行委員選舉更堪憂慮。³⁹

³⁷ 〈在國民黨廣州市黨員大會上的演說〉（1923年11月11日），頁579-580。廖仲愷是在石龍行營記下孫中山的話，當時孫正忙於指揮對陳炯明部的戰事。

³⁸ 落力拍演，為時任社會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阮嘯仙的話。阮嘯仙，〈致劉仁靜信〉（1923年11月13日），阮嘯仙文集編輯組編，《阮嘯仙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03；〈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報告〉（1923年12月10日），頁304。廣州市各級黨部之改組過程，詳見深町英夫，《近代廣東的政黨·社會·國家——中國國民黨及其黨國體制的形成過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220-225。

³⁹ 〈鄧澤如等十一人致孫中山函呈〉（1923年11月29日），原蹟複印件，收入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300-310；〈鄧公澤如事略〉，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以委員會形式作為領導、組織的新制，勢必衝擊國民黨以總理為中心的領導和政治參與模式，這是「質變」；新制度亦為跨黨黨員共預黨務的有力憑藉，更是國民黨舊人擔心中共藉由「量變」而行「用夷變夏」的關節所在。廣東省財政廳長鄒魯曾向孫中山提醒國民黨「向禮重情」的傳統，指東周雖弱，「猶賴諸侯尊王，延數百年之祚」，而以俄人方法之「不重情」為慮。孫的應對頗值玩味。他承認「吾黨之情感至重」正是仍能「精神脈脈相通，共向革命」的憑藉，似不反對「尊王」之說；另外，他也相信，今後若借鑑俄國進行改組，必定更能「得其益而無其弊，直可駕蘇俄而上之」。⁴⁰ 孫還透過批復廣東支部彈劾案，再次表露了翻新領導、組織制度的思慮，並針對總理與各級委員選舉一事，借勢宣稱：國民黨「日日退步」的原因就在於「不圖進步改良」，正因為他「一人所見有限，故不得不付之公舉，亦自覺所任常有不當之處，故不得不改革」，如果黨人對新的黨務參與機制存疑，就應該如他希望的各自扛起責任，「嚴為監視，如察悉有弊端，立為指出」。⁴¹

肆、總理專章的權力槓桿化想像

1924年1月20-30日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素以奮發蹈厲的時代代表徵聞於世，然而另一個並行不悖的事實則是：會場內外延續了部分國民黨員兩、三個月來的疑慮，說改組有流於「赤化」、「布爾什維克化」的嫌疑。根據鮑羅廷等共黨分子的理解，這些指控主要是源於所謂「海外反動代表」擔心日後不容易在殖民地繼續立足的心理。⁴² 事實上，孫中山自己也公開證實了一批「老同志」頗有一股「誤會、懷疑、暗潮」，其中「懷疑尤甚者為海外同志」，據稱

會西南執行部編，《鄧公澤如逝世一週年紀念專刊》（廣州：編者，1935年），頁9。

⁴⁰ 鄒魯編，《中國國民黨史稿》，頁412-413；鄒魯，《回顧錄》，第1冊，頁158。

⁴¹ 〈孫中山批復鄧澤如等十一人〉（1923年12月），頁306-307、309。

⁴² 鮑羅廷等人的理解和稍前廣東支部自述的彈劾動機並無二致。〈斯列帕克致魏金斯基的信〉（1924年2月8日），與〈鮑羅廷筆記和報告紀錄摘要〉（不早於1924年2月16日），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1卷，頁332、354；陳實庵，〈國民黨與共產主義者〉，收入民國日報社編，《中國國民黨改組紀念——民國日報特刊》（上海：民國日報社，1924年），頁38。

他們連番質問國民黨的改組是否就是「改成共產黨」，馴致「種種懷疑，不能自釋」。⁴³

長期以來，學界多將一全大會內的國共「暗潮」聚焦在理論理念和團體認同等幾個重大問題上，實則忽略了俄人辦黨的方法論經過鮑羅廷橫向移植以後，形成會場內外「懷疑」、「暗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尤以領導架構的大幅變革最讓疑共分子糾結於斯，蔚為「不能自釋」的又一環節。⁴⁴ 1月22日，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向大會提出章程草案，臨中執委孫科特別提請全場注意草案建構了一套有別於舊章的領導、組織體系，「而本黨之主權並不在總理」；嗣由大會派定19人組成章程審查委員會，涵蓋跨黨黨員、友共乃至疑共分子，頗有兼聽、調和之意。⁴⁵ 儘管如此，陳獨秀尚不免抱怨說道，章程草案採用委員制，仍淪為人云「赤化的證據」。⁴⁶ 又根據羅斯塔通訊社（Russian Telegraph Agency, ROSTA）記者斯列帕克的觀察，有大會代表認為跨黨黨員懷有奪權企圖，說有了中執會，恐怕總理就要退居次席了。⁴⁷ 截至22日，蘇聯駐北京外交使團領導人加拉罕（Lev Karakhan）從廣州消息來源得到的印象則是：一些來自殖民地的代表深怕將來黨章和中執會約束孫中山的行動，擔心削弱孫的領導威信，所以提出

⁴³ 「總理關於民生主義之演說」，見〈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4號（1924年1月21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1/10。

⁴⁴ 理論理念的暗潮包括：孫中山為了平息疑共分子對於宣言草案的訾議，遂「再行剖解」、極大化自己的民生主義，還將共產主義涵攝於內，以示兩者「毫無衝突」，接著又要求與會代表遵行宣言旨趣，期能貫徹反帝、反軍閥的決心；團體認同的爭執：各方代表曾就國民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問題進行言詞交鋒，經交付表決，決議「不必用明文規定於章程，惟申明紀律可也」。引號內文字出自〈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4、8、12號（1924年1月21、23、28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1/10。

⁴⁵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5號（1924年1月22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1/10。章程審查委員：謝持、何世楨、譚平山、丁惟汾、廖仲愷、茅祖權、孫科、朱霽青、李大釗、蕭佛成、汪精衛、張知本、戴季陶、居正、于右任、毛澤東、石瑛、鄧澤如、謝英伯。同日，胡漢民也向大會闡述「民主集權」做為支撐新權力結構的組織原則，要把國民黨人「服從領袖」的習慣與來日「羣眾政黨」之「民主主義的集權制度」兼容並蓄。「主席團胡漢民說明『紀律問題』案」，〈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6號（1924年1月22日）。

⁴⁶ 陳實庵，〈國民黨與共產主義者〉，頁38。

⁴⁷ 〈斯列帕克致魏金斯基的信〉（1924年2月8日），頁332。

一系列的修改意見，希望賦予孫在黨內的特殊權力。⁴⁸ 這些共黨菁英的說詞未必都是向壁虛造，例如鄒魯就坦陳一些國民黨員「終恐黨為人利用，發生危險」，憂慮黨被「多數中央執行委員所賣」，復擔心「野心家謀為總理」，因此主張增列以孫中山做為具體指涉對象的總理專章，意欲透過折衷後的權力調節機制，防止跨黨黨員擴大影響。⁴⁹

1月23日，章程審查委員會沒能及時完成全案審查。下午，大會透過主席孫中山的導引，臨時變更議程。官方紀錄沒有充分交代審查延宕的原因，只說是案子「印刷未完」、「全章條項太多」。⁵⁰ 實際上，章審會的工作時間有限，還要應付各方代表和海外黨人未盡苟同草案而提出的書面意見與會場輿論，包括領導制度的爭議在內，這應該才是他們遷延任務的主要原因。根據大會代表李宗黃的晚年回憶，23日上午，會場有些代表堅持總理制度無需更改，意態嚴正，甚至與孫中山各持立場，往復辯難，情形「極為罕見」。⁵¹ 李的憶述沒有得到大會會議錄、新聞報導、俄方工作報告等材料的直接證實，惟所鋪敘的總體情境仍具有參照價值，也能和會場其後走勢構成重要的連結效果。⁵² 例如根據大會會議錄，23日，或最遲24日上午開議前，章審會即已決定沿用1年前「改進版」的總章成例，回應國民黨人彰顯母黨主體性格的願望，在章程卷首增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做為黨人奮鬥理念的引文，並「特加總理一章」，「其章次俟將來整理條項時再定」。會議錄所稱的「特加」之舉，和李宗黃所說眾人經過往復論辯而形成專章腹案的時間點大抵若合符節。⁵³

⁴⁸ 〈加拉罕致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1卷，頁336。

⁴⁹ 鄒魯編，《中國國民黨史稿》，頁351。

⁵⁰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5、8-9號（1924年1月22-24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1/10。

⁵¹ 李宗黃，《李宗黃回憶錄——八十三年奮鬥史》，第3冊（臺北：中國地方自治學會，1972年），頁100-101。李宗黃時任駐粵滇軍第二軍參謀長。

⁵² 根據國民黨的會議錄和報紙報導，上午首先討論的是「出版及宣傳問題案」，孫中山中途到會後接續討論「組織宣傳問題審查委員會案」。〈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7號（1924年1月23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1/10；〈昨日國民黨大會紀要〉，《民國日報》，廣州，1924年1月24日，版3。

⁵³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9號（1924年1月24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1/10。

學者指出，總理專章的形成，其實是來自國民黨人的「防共」思維。⁵⁴ 根據前引的多元報導，可以部分地印證此一觀點；但必須慎重說明的是，「防共」論點通常忽略了如下事實：19名章程審查委員的政治意識未盡協同，惟特加專章之議基本上並未遭遇嚴厲反對。換言之，這事著實也離不開跨黨黨員與友共分子的默許，甚至是某種「制右」思維的助成。無庸置疑，孫中山確係一全大會各方意識角力下的最大公約數，暫取鮑羅廷的話看：孫擺盪在「革命」與「小資產階級市儈」之間，猶如水珠，可以折射出國民黨人意識雜沓的光影；但鮑也提醒自己，改組離不開孫，要利用其個人威信、建黨願望，以加強國民革命運動的左翼力量。⁵⁵ 正是這種「離不開」孫的情結，像前國民黨本部總務部長彭素民一類的友共分子（被共黨歸為左派），甚至也算是特加專章的提議人之一。⁵⁶ 事實上，一全大會尚未閉幕，跨黨黨員與友共分子就已顯現期於孫的「功利性」需要。1月30日，會場針對業已通過的宣言政綱是否該在反帝國主義立場上朝向更為清晰具體的方向進行增修而有所爭論，沈定一、彭素民突出了總理特權的地位，意以孫的意思為定奪。⁵⁷ 日後，汪精衛曾在「左」味瀰漫的二全大會中公開指出，「關於總理的那一章」是一全「大會各代表都請求」加入的。他的回憶即便稍事浮誇，取其總體輪廓而言，總不失吾人參考。⁵⁸ 跨黨黨員包惠僧曾在廣州幫辦國民黨幹部的訓練事宜，所言最是坦白：「從實質上說這個總理制度就是國共合作的

⁵⁴ 「吳文津評論」，收入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3冊（臺北：編者印行，1981年），頁97；韋慕庭，〈孫中山的蘇聯顧問，1920-19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987年6月），頁287。

⁵⁵ 〈鮑羅廷筆記和報告紀錄摘要〉（不早於1924年2月16日），頁351-353。參見學者陳三井的引用：〈俄國新檔中所見的孫中山〉，陳三井，《舵手與菁英——近現代中國史研究論叢》（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8年），頁67。學者蔣永敬認為鮑羅廷思借孫的威信，壯大國民黨的「左派運動」以「清君側」：蔣永敬，〈孫中山與鮑羅廷〉，《近代中國》，第157期（2004年6月），頁7。又如中山傳記作者白吉爾的觀察，藉由專章賦予孫特權，鮑羅廷肯定還能連帶收到強化自己力量的好處。Marie-Claire Bergère, *Sun Yat-sen*, trans. by Janet Lloy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30.

⁵⁶ 鮑焱，〈一江風浪縱虛舟——著名國民黨左派彭素民紀事〉，《黨史文苑》，2005年第17期（2005年9月），頁25。

⁵⁷ 黃季陸，〈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憶〉（臺北：國史館，1978年），頁27-32。

⁵⁸ 汪精衛，〈政治報告〉（1926年1月6日），收入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政治部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經過概略及各種重要報告》（未著出版地：編者，1926年），頁31。

保障，否則那些右派分子隨時隨地可以起哄，製造國共聯合戰線的破壞活動。」⁵⁹ 據此平議，特加專章之舉恐怕不宜被化約為疑共分子的單一方面勝果，恰正相反，它毋寧更像是「左」、「右」兩造競以孫中山為支點而借力尋求制衡的某種權力槓桿化想像。

前已提及，孫中山對黨人「尊王」之說並未刻意駁正。一全期間，孫繼續堅持領導改制，實則仍未反對設置總理專章。揆諸常理，總理專章的出現，誠不能缺少孫中山的首肯或容許；再者，孫應能明白專章將是統攝黨內意識多元現狀的有力憑藉。據此，李宗黃透露孫最終是被動順應、「姑從眾」的態度，差堪不誤。⁶⁰ 1月25日，孫赴一全會場宣布列寧死訊，講話內容最能顯示他對俄共領導方式能夠採取一種非機械性的理解立場：一方面，孫認為此「革命中之聖人」的辭世，適足以讓國民黨明白「把黨基鞏固起來，成為一有組織的，有力量的機關」、把「革命重大責任分之眾人」、「使本黨不要因為本總理個人而有所興廢」的重要性，意欲排遣「有人以此次由總理制改為委員制，覺得不大妥當」的氛圍；另一方面，又將委員制詮釋為列寧「一生的工夫，全結晶在黨中」的成就，強調俄國革命之成功，「全由其首領列寧先生個人之奮鬥，及條理與組織之完善」，語間已能洞澈「革命聖人」之個人作用必不致被「條理與組織」給吞沒的實際情態。⁶¹

伍、總理特權與委員合議的共構

1月28日，一全大會通過經審查修正、討論公決的章程草案，即「改組版」的「中國國民黨總章」。⁶² 新總章雖有局部修正，實則並未脫逸草案預先框定的

⁵⁹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44。

⁶⁰ 李宗黃，《李宗黃回憶錄》，頁100-101。

⁶¹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11號（1924年1月25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1/10。

⁶²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13號（1924年1月28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1/10；〈中國國民黨總章〉（1924年1月28日），收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決議案》（廣州：編者，1924年），頁

架構，惟需注意之新異部分：第一、卷首特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促進三民主義之實現、五權憲法之創立，特制定中國國民黨總章如左」一段引文，這是從一年前「改進版」總章的制定經驗複製得來，無非要彰顯純粹國民黨員的主體意識與奮鬥理念，以便籠罩全黨全體。⁶³ 第二、增列特別地方黨部組織與各級委員任期的相關規定。⁶⁴ 第三、最涉關節之處，當屬增設「總理專章」（第四章），規定「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黨員須「從總理之指導，以努力于主義之進行」；總理為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對於全代會的議決有「交覆議之權」，對於中執會的議決有「最後決定之權」。⁶⁵

國民黨改組做為「革命之再起」的政治宏業，曾帶給國民黨人時代一新的感受。有些純粹黨員的政治態度容有差異，但在各自人生的不同階段，提到一全大會帶給國民黨領導制度的變化，倒也相信是從總理制轉為委員制，⁶⁶ 亦不忘強調黨員仍待總理「扶持」、「督促」、「訓育」，即「總理要拿他的革命未了的生命，來培植一個能夠獨立發展的中央幹部」。⁶⁷ 一全大會期間，像戴季陶這類親

24-40。

⁶³ 1923年1月公布的「改進版」總章，其卷首引文整合了1919年以降舊規章的相關條文，並透過獨立置前的形式，形成統領全章的嶄新語境。〈中國國民黨總章〉（1923年1月2日），收入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8輯（臺中：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55年），頁41。

⁶⁴ 關於明訂任期，有學者認為同樣是為了防止中共擴張影響力而設。「吳文津評論」，《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3冊，頁97。但其實俄共的鄉委員會、支部委員會與中共各級委員的任期一樣也有規範：〈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章程〉（1919年12月），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1分冊，頁597；〈中國共產黨章程〉（1922年7月），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94-95。

⁶⁵ 〈中國國民黨總章〉（1924年1月28日），頁27-28。

⁶⁶ 例見黃季陸發言，〈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14號（1924年1月29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1/10；劉蘆隱，〈革命與反革命〉，《中央半月刊》，第11期（1927年11月15日），頁9；李宗黃，《中國國民黨史》（上海：民智書局，1928年），頁28；鄒魯編著，《中國國民黨史稿》（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頁436；何香凝，〈我的回憶〉（1961年10月），收入尚明軒、余炎光編，《雙清文集》，下卷，頁939；李宗黃，《李宗黃回憶錄》，頁101。

⁶⁷ 「扶持」、「培植」：劉蘆隱，〈革命與反革命〉，頁9；「督促」：鄒魯編著，《中國

炙孫中山的幹部在承認總理專章展現了「主義之人格化」精神的同時，仍然將俄共委員會體制視為國民黨全黨同志接受孫中山付託，據以擔負主義「至於成立之責任」的「最進步之方法」，認為「此次本黨改組，乃以獨裁制改為合議制之起點」，頗能道出黨內領導制度開始呈現轉型中的動態意義。⁶⁸ 事實上，總理特權緣起於一全大會各方勢力的現實需要，俄共委員會體制則是孫中山「師俄」必不可免的學習模板，兩者相須而共治於總章、共同投入黨務運作的結果，已不完全等於孫中山「個力」治黨的舊經驗，反倒更像是形成一種上下共構、二元共轉的「複層權力空間」，其權力運作關係不只是純粹的國民黨員，即使連跨黨黨員、鮑羅廷都要重新適應。

中執會組成後，孫中山的總理職位首先是做為「訓黨」的崇高角色而建立其在委員合議機制中的嶄新正當性，並顯示二者的上下相對位置。然而在複層權力空間的施作動態中，總理權力雖占有制高地位，畢竟不能脫離委員合議的整體框架而單獨存在，也未必「黨事無巨細，咸決於孫」或盡皆抓大放小。在廣州，國民黨高層菁英逐漸熟悉以俄式委員會做為運轉平臺的合議機制，並發展出相當程度的合議作為。以1924年1月底至11月13日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前為例，孫參加並主持了中執會58次會議中的14次，近四分之一比例；如果孫未能到會，則最常用由廖仲愷（中執委兼常委、工人部長）、胡漢民（中執委兼聯絡部長）、鄒魯（中執委兼常委、青年部長）等委員主持議事工作。⁶⁹ 透過動態的實踐過程，黨的中央委員們一方面相信「本黨總理制時代」已隨改組而結束，一方面則學習和總理特權及其指導地位共處。⁷⁰ 其中，「最後決定之權」自是總理「訓育」中執會的制度化表現，最是總理特權的明白表示；不過衡諸總章條文與實際運作，其行使程序應以中執會的先議先決為前提，非可憑空濫使。

國民黨史稿》（1938年長沙版），頁436-437；「訓育」：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上海：明東書局，1925年），頁30-31；李宗黃，《李宗黃回憶錄》，頁101。

⁶⁸ 「戴季陶致熊克武等人函」（1924年1月27日），戴季陶，〈國民黨的繼往開來〉，收入民國日報社編，《中國國民黨改組紀念》，頁8-10。

⁶⁹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臺北：編者，1954年），頁1-109。以下縮寫為《一屆中執會紀錄》。

⁷⁰ 〈中央監察委員會審查報告書〉，第2號（1924年4月），《一屆中執會紀錄》，頁55。

一、總理的「最後決定之權」與交議事項

1924年1月一全大會閉幕後，中執會立即組成運作，其與總理「最後決定之權」的互動值得注意。根據實際運作經驗，這項特權的行使大致可歸納為三種形式，占孫中山逝世前66次中執會會議討論案約5.6%比例（35件／625件）：

（一）孫中山針對中執會決議進行事後修正，或正向強化之。凡此，均經中執會會議紀錄載明「總理最後決定」字樣。孫逝世前，共行使4次事後修正，且均在中執會組成初期，包括：1. 1924年3月，將「軍隊黨團組織通則」設各級執委會委員長1人的規定，改為設主席1人。⁷¹ 2. 4月初，將黨員領取黨證的相關決議規定放寬處理。⁷² 3. 4月上旬，廣州學生黨員大會在跨黨黨員的運作下，決議就中俄交涉事宜發出宣言，陰有挾勢壓迫北京政府「承認蘇俄，速簽俄約」的企圖，實則凸顯了國民黨同時面對聯俄與南北正統之爭的進退失據。中旬，就中執會聽取該次大會活動報告而未明白反對的情況下，由孫中山在下次會議動用了「最後決定」，以「北庭本不能代表中華民國，其對俄交涉如何辦理，不必管他」為由，要求不必發出宣言。⁷³ 4. 4月底，將中執會對北京《時言報》津貼案交付北京執行部斟酌辦理的決議，調整為每月定額補助。⁷⁴

值得注意的是，「最後決定之權」在第五次形諸文字名義的行使經驗裡，反而供作正向強化中執會立場的意思表示。當時國民黨甫經改組，但是黨政聯繫機制尚未充分建立，多賴孫中山以總理／大元帥的雙重身分銜接。在這種背景下，中執會決議賦予工人部以審查、改組業經官署立案之工會的權力，對於將來呈請立案的工會也有權先行審查。幾天後，總理利用「最後決定」增強了中執會的決

⁷¹ 〈中國國民黨軍隊黨團組織通則〉（1924年3月5日），《一般史料》，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465/100.4；第11、12次會議（1924年3月5、8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22-24。

⁷² 第18、19次會議（1924年3月30日、4月7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36-37。

⁷³ 〈中央青年部上中執會報告稿〉（1924年4月8日），《中央前五部檔》，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部4427；第20、21次會議（1924年4月10、14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41-42；敖光旭，〈失衡的外交——國民黨與中俄交涉（1922-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頁159-160。

⁷⁴ 第18、25次會議（1924年3月30日、4月28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37、54。

議效果。⁷⁵

（二）中執會將某些決議結果呈請總理核准，含有尊重的意思，若干則為事實需要。例如：1. 部分人事與預算：1924年2月，決議通過中央與各執行部預算案，並交總理最後裁定。⁷⁶ 2月以降，決議推定曾醒擔任婦女部長、推定上海《民國日報》編輯委員會人事、推定民智印務公司經理、通過海外部所提南洋總支部部長案、推定李章達任農民部長，均呈請總理核准。⁷⁷ 2. 容共路線爭議：指7月份黨內分共聲浪升高，中執會決議舉行全體會議妥籌解決，並呈請總理召集一案。⁷⁸ 3. 事涉黨政聯繫，仍有賴孫的雙重身分銜接：3月，因大理院長趙士北主張「司法無黨」，婉拒配合中執會作為，遂決議由政府撤免職務，當經總理核准。⁷⁹ 6月，決議修正通過農民部所提「農民協會章程草案」，並建議大元帥批行，奉批照准。⁸⁰ 7月，廣州市黨部函請中執會訂頒工會條例，中執會經草擬，於8月決議通過「工會法草案」，並呈請總理以大元帥名義公布。⁸¹

（三）中執會就某些討論案之未有具體主張者，決議呈請總理決定。例如：

⁷⁵ 第33、35次會議（1924年6月2、9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69-71。

⁷⁶ 第3、4次會議（1924年2月6、9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4-5、8。

⁷⁷ 第9、10、17、18、50次會議（1924年2月27日；3月1、27、30日；8月11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17、34、37、97；〈中央秘書處上總理呈稿〉（1924年8月17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2011；〈大本營秘書處致中執會函〉（1924年8月22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2013.1。

⁷⁸ 第40、43次會議（1924年7月3、14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79、85。

⁷⁹ 第18次會議（1924年3月30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37。

⁸⁰ 〈大本營秘書處致中執會函〉（1924年6月28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472；第35-37次會議（1924年6月9、12、16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71-72、74。

⁸¹ 〈廣州特別市執委會致中執會函〉（1924年7月8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493；〈中央秘書處復廣州特別市黨部函稿〉（1924年7月18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473；〈中執會致廖汪戴鄧劉五同志函稿〉（1924年7月18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468；〈中執會呈總理文〉（1924年8月8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474；第42、49次會議（1924年7月10日、8月7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84、92。

1. 部分人事：1924年1月，中執會決議由總理派定預算委員會委員。⁸² 4月，決議由總理圈定廣西臨時省黨部執委；決議由總理核准委任湖南臨時省黨部執委；決議由總理指定廣州市黨部執監委候選人。⁸³ 6月，決議將上海執行部委員補缺案交總理決定。⁸⁴ 2. 情節發生於改組前的懲戒案：4月，決議將墨西哥支部黨員余毓緒開除黨籍案、中執委柏文蔚被控案交總理決定。⁸⁵ 3. 9月，決議將軍官學校校長蔣介石造報預算聲請中執會指定機關撥款案呈請總理指定。⁸⁶

孫中山除了對中執會行使「最後決定」外，有時也會主動交議事項，這可以分成兩部分考察：第一、如果孫交下的是自己的諭令，則中執會總會接受，並做出各項處理意見，這種情況占總討論件數的1.3%（8件／625件）；⁸⁷ 第二、有時候，孫也會發下黨員的建議或請求，供中執會自由討論，眾人多能做出實質可否之議決。⁸⁸ 論者有謂中執會慄於總理的「最後決定之權」，故面對交議事件時，「實質是研究如何領會其意旨」，以便做出決議。⁸⁹ 這個說法混淆了交議內容的兩種形式，也放大了孫中山發下每一件黨人建請案的目的性及與中執會決議走向的因果連結。倒是在1924年11月份交下的一件黨人請求案中，孫中山罕見的預先批示了自己的立場，「意旨」之明確甚至不待「領會」，然而中執會並未伴

⁸² 第1次會議（1924年1月31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2。

⁸³ 均見第23次會議（1924年4月21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47-48。

⁸⁴ 第37次會議（1924年6月16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74。

⁸⁵ 第24、25次會議（1924年4月24、28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51、53-54。又例如將柏案所牽動的張秋白等人開復黨職黨權案呈請總理決定：〈中央秘書處上總理呈〉（1924年8月2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8740；第47、50次會議（1924年7月28日、8月11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90、96。

⁸⁶ 〈中執會上總理請為軍校教導團指定撥款機關呈〉（1924年9月18日），《一般史料》，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454/49；第53、54次會議（1924年9月8、11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99、101。

⁸⁷ 包括黨員不得任意設立以「中國國民黨」冠名之組織、戒責廣州《民國日報》、將商團總分所房屋充公、擇員常駐韶關宣傳並組織、撫卹黨員等。第14、17、53、58、59、60、64次會議（1924年3月15、27日；9月8日；11月6、27日；12月11日；1925年2月9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28、32、99、108、113。

⁸⁸ 綜見第9、22、24、39、47、57、58次會議（1924年2月27日；4月17、24日；6月30日；7月28日；10月23日；11月6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16、45、50-51、78、90、107-109。

⁸⁹ 崔之清主編，《國民黨政治與社會結構之演變（1905-1949）》，上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頁374。

食畫諾。當時上海國民黨人的左右之爭甚烈，波及當地《民國日報》的社務，編委瞿秋白上書孫中山，直指報社「言論詭異」之情狀。孫將函呈交下中執會，著「妥議辦法，應行改組」，但中執會截至12月中旬的兩次會議討論，未得共識，決議「暫擱」。⁹⁰

二、對於黨務運作分類考察

在國民黨總理「總攬本黨一切事務」的舊時代，孫中山慣於直接行使權力。改組後，總理特權及其個人威望仍然發揮重要的影響，惟持平而言，黨的組織日漸科層化、事務日漸繁冗化，孫中山對於重要人事與國共事務的關注最為明顯，然則盱衡所有黨務，未必再是總攬一切；另一方面，孫的權力施作多要透過中執會「黨令」之所出的新穎身分而曲折表現，此格外有賴於孫的思維調整乃至自制。中央的議事文化並非總是沉悶。據鄒魯回憶，當孫參加黨內會議時，黨員有辯論的自由，總理也有從善如流的時候。⁹¹ 整體而言，孫中山扮演全黨領航角色之際，確有扶持、培植幹部自立於同舟的事實表現。茲分項說明之：

（一）關於重要人事，改組前本由總理委任，改組後亦最是總理意志介入的範圍之一，惟實際運作方式仍呈現多元：或由總理指定、圈選；或由中執會推定人選後呈核，總理多能給予尊重；或由中執會合議決定。以中央層級部長為例，即顯示如上錯綜而未必規律的運作特徵。例如孫中山逝世前，農民部長歷林祖涵、彭素民、李章達、黃居素（代理）、廖仲愷5任，各人分據政治光譜，其人事常出於總理之預決，但也有例外，至於去職則多經中執會裁可。⁹² 1924年4月14日，孫中山主持中執會會議，會上討論林祖涵函請中執會同意調辦漢口執行

⁹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鮑羅庭同志的信〉（不晚於1924年10月10日），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1卷，頁441；周永祥，《瞿秋白年譜新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年），1924年10月8、21日繫事，頁133、135；第59、60次會議（1924年11月27日、12月11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99-100、110-111。

⁹¹ 1945年3月，對顧維鈞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479。

⁹² 林係跨黨分子，彭、李、廖3人立場友共，黃則被共黨視為「右派」。

部黨務一案，經決議准辭部長。3日後，中執會決議以彭素民接任。⁹³ 8月，彭病逝，中執會會議討論祕書處所提補選農民部長案，決議推李章達出任「並呈候總理核定」。孫在會前並未預示人選，亦未出席當天會議，會後則能同意公議結果。⁹⁴ 李就任未久，因病請辭，其請假、請辭的對象仍是中執會與常務委員。⁹⁵ 10月，汪精衛與廖仲愷「商酌」後，函請中執會同意由黃居素代理農民部長獲准。這件代理案背後是否反映總理的意向尚難論定；可知者，至少與廖、黃2人交篤有關。⁹⁶ 惟黃署任後，意識立場難與祕書彭湃等人協和，橫遭部內跨黨分子的嚴重抵制。⁹⁷ 11月，就在農民部阨陞不安的情勢下，孫中山才決定直接介入，手諭中執會，著廖仲愷兼部長，黃居素改而代理海外部。⁹⁸ 不應忽視的是，孫中山以總理手令繞過委員合議而逕決部長人事的例子絕少，理合放在個別的、動態的情境求其原委，要之並非常態。⁹⁹

⁹³ 第21、22次會議（1924年4月14、17日），〈一屆中執會第一～一三一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3/19；曾成貴，〈中國國民黨漢口執行部解析〉，《民國檔案》，2009年第4期（2009年11月），頁85。

⁹⁴ 第50次會議（1924年8月11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97；〈中央祕書處上總理呈稿〉（1924年8月17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2011；〈大本營祕書處致中執會函〉（1924年8月22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2013.1。

⁹⁵ 〈李章達致中執會函〉（1924年9月10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2019.1；〈李章達致中執會函〉（1924年9月16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2021.1。

⁹⁶ 〈汪精衛致中執會函〉（1924年10月2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2022.1；〈中央祕書處致黃居素函稿〉（1924年10月9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2022.2。1925年，廖再推薦黃居素擔任中山縣長。郭昉凌，〈兩任中山縣長黃居素〉，《中山日報》海外版，中山，2011年12月25日，版A3。

⁹⁷ 參見第56次會議（1924年10月20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104-105；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年），頁274-275；蔡洛等，《彭湃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98；李慶剛，〈彭湃出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祕書有關問題考辨〉，《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6期（2007年11月），頁124。

⁹⁸ 〈總理任廖仲愷黃居素許崇智蔣中正等為部長祕書手令〉（1924年11月11日），《一般史料》，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051/265；〈中央祕書處致廖仲愷函稿〉（1924年11月11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2030。

⁹⁹ 綜見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年），頁32-36。

（二）在組織事務方面：總章規定中執會分設中央各部並管理之、決定各部職務及組織法、組織各地方黨部並指揮之。¹⁰⁰ 考諸實際，中執會確能履行職權。例如1924年4-5月間，東京黨務人事與組織陷入嚴重分立已逾1年，雖有黨人呈請總理早日「指令」中執會遴員重建，卻也有黨人直請中執會介入，商請「諸公加以十分考慮」，凡此不一而足，顯示國民黨轉型期間新舊作風並陳的實態。最後，這事透過海外部、青年部的提案，由中執會做出具體議決。¹⁰¹ 更多時候，也有黨員能視中執會為「高級之機關，有權處決一切之事宜」而上書條陳黨務意見，「統候公議裁擇施行」。¹⁰² 比如中執委覃振、候補中執委張知本原來負有監督指揮漢口執行部及轄下湖北、湖南、陝西3省黨務的名義，卻不滿於跨黨分子林祖涵等人「同床異夢」而未視事；其後，兩人鑒於湖北督軍蕭耀南武力拘捕共黨而波及漢口部務，認為「始基既誤，補救維艱」，乃相繼函呈中執會，請求「公鑒」、「公決」，「收束一切」。7月，中執會會議聽取林祖涵報告漢口執行部及三省黨務情形後，即大體依照張知本所擬提案內容，作出「暫告結束」和相關善後措施的決議。¹⁰³

整體而言，透過上下級別的互動，既有助於中執會逐漸建構起「黨權（黨的支配權）」持有者的身分，也有利於形成一種「黨中央」的嶄新名器意象。¹⁰⁴ 例如有黨務工作人員直陳地方黨務紛亂情狀，認為「非集中權力於中央」則不足以促成地方「進行之利便」。「中央」係指中執會，取其整體之義，無關某一個人。¹⁰⁵ 又如1924年春，武漢的純粹國民黨員不滿林祖涵包辦漢口執行部之餘，

¹⁰⁰ 〈中國國民黨總章〉（1924年1月28日），頁26、29。

¹⁰¹ 〈東京第二分部代理總幹事費哲民來函〉，第24次會議（1924年4月24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51-53；〈中執會致費哲民函〉（1924年4月26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4416.2；〈劉奮翹致青年部長鄒魯函〉（1924年5月），《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4416.1。

¹⁰² 〈黃發文上中執會呈〉（1924年5月1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2660.1。

¹⁰³ 〈覃振上中執會呈〉（1924年6月17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0283；〈張知本上中執會提案〉（1924年6月25日），檔號：漢5580；〈中央秘書處致林祖涵同志函稿〉（1924年7月1日），檔號：漢4815；第41次會議（1924年7月7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81。

¹⁰⁴ 在某些時候，「黨權」有第二層意思，即黨員參與黨內活動的權利。

¹⁰⁵ 〈劉爾崧致中執會函〉（1924年5月18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

復指控項英妄稱「中央特派員」行事，強調同人對此「百思莫得其解」。他們說道：項德隆（英）「謂為本黨中央乎？則本黨中央委員並無其人。惟器與名，何可以假？」¹⁰⁶

（三）在經費度支方面：國民黨總章規定，中執會擁有支配黨費及財政的權力。第一屆中執會組成時，曾決議由總理派定中執委、中監委共7人組成預算委員會，負責制定兩會與各執行部預算，嗣由中執會修正通過預算案，並呈孫最後裁定，以示尊重之意。¹⁰⁷ 中執會正式運轉後，除前述軍官學校、彭素民撫卹案等少數情況外，對於經費撥發、黨費減收、黨人撫卹、各方津貼補助請求等財政事務，多有具體討論和決議。¹⁰⁸ 1924年6月，中執會曾婉拒北京執行部等方面的撥款補助請求，而在同一期間則是透過委員實地訪查，同意上海執行部請求中執會「核准」、「核奪」，以及浙江臨時省黨部「維〔惟〕中央執行委員會裁可」的增加預算案。類此情形，尤能顯示中執會面對黨內食指浩繁之現狀，做為黨人以「中央」相視、相「懇請」的制高身分，確有審處、具體分配黨內資源的職能與實際表現。¹⁰⁹

（四）在黨的代表身分上：同盟會時期，總理「對於會外，有代表本會之權」；直到國民黨實施改組前，仍以總理「代表本黨」；及至改組，總章具體規定中執會的職權，包括「代表本黨對外關係」，此直接脫胎自俄共章程，迥異於國民黨的舊經驗。¹¹⁰ 此後看來，黨務領導權威所寄，實際上呈現了孫的「個

黨黨史館藏，檔號：漢0157。

¹⁰⁶ 詳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285。

¹⁰⁷ 第1、3、4次會議（1924年1月31日；2月6、9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2、4-5、8。

¹⁰⁸ 例見《一屆中執會紀錄》，頁8-9、12、22、30、37-38、54、56、60、62-63、69、81、84-85、87、89-91、93、97-105、108-114各處。

¹⁰⁹ 第35-37次會議（1924年6月9、12、16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71-72、74-76；〈上海執行部提出江蘇臨時省黨部變更預算案〉（1924年6月9日），《一般史料》，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435/37。

¹¹⁰ 〈中國同盟會總章〉（1906年），鄒魯編，《中國國民黨史稿》，頁38；〈中國國民黨總章〉（1923年1月2日），收入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8輯，頁41；〈中國國民黨總章〉（1924年1月28日），收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決議案》，頁29。

力」未歇、兼及中執會之「黨力」新生的同步發展現象。¹¹¹ 對外，中執會有時秉承孫中山的意思發布黨的宣言，例如針對「中俄協定」；有時則主動決定發表，總理未必預聞，例如1924年5月，漢口執行部工農部幹事楊德甫等跨黨黨員遭直系軍閥羅捕，上海執行部、廖仲愷等人主張中執會應以「本黨名義」發表宣言，中執會經討論後同意，至於「政府應否發表宣言」，則待徵求孫的意思。¹¹² 對內，中執會能持續發出通告、訓令，逐漸構建自己做為黨令之所出的地位，即使孫中山偶有主見要下達黨人，也能體認到中執會的新穎身分，常給予操作上的尊重。例如1924年3月，當他要求冠以中國國民黨名義的黨員團體應即取消以免混淆視聽時，指令是透過中執會的名目發出；¹¹³ 又如中執會領受孫的意向而通告從政黨員服從黨義、嚴守紀律時，具銜通告的主體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孫則以「主席」名義副署於後，而非總理。¹¹⁴

（五）在黨紀懲戒方面：以組織的強逼紀律相繩於黨員，本即是國民黨改組亟欲構建的黨內運行準則之一。改組版總章規定，各級執委會針對各級監委會審查彈劾案之結果擁有判決處分的職權，這和以往總理個人在懲戒程序中所承擔的主動、關鍵角色不同；¹¹⁵ 至於驗諸改組後的實際運作，則又不能不雜以總理的訓育身分等新舊面向，遂仍衍為多樣的表現形態。茲歸納為初期「適用總理制」的特殊情況、一般情況、國共關係等三項說明之：

¹¹¹ 1923年12月，上海《民國日報》發文指陳國民黨只見「個力」而無「黨力」的事實，以致掛名黨員者雖眾，黨的主張卻無由實現。學者呂芳上認為這情形到改組改用委員制後才有轉變。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頁536-537。

¹¹² 〈上海執行部上中執會電〉（1924年5月30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6121；第33、43次會議（1924年6月2日、7月14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69、85-86。

¹¹³ 第14次會議（1924年3月15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28。

¹¹⁴ 〈中執會通告〉（1924年3月16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3235；第14次會議（1924年3月15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29。

¹¹⁵ 〈中國國民黨總章〉（1924年1月28日），頁38；〈中國國民黨總章〉（1923年1月2日），頁44。「中華革命黨總章」雖曾規定設司法院，裁判黨員、組織的爭執與處罰事宜，但實際上並未成立。崔之清主編，《國民黨政治與社會結構之演變》，上編，頁203-204。

1. 初期「適用總理制」的特殊情況

一全大會閉幕後，孫中山曾向中監會面示「凡改組以前發生事實，應呈由總理自行判處」的原則。據此，中監、中執兩會曾在4月認定余毓緒、柏文蔚被控案的內涉情節符合前述指示方針，事發「是在本黨總理制時代」，「當於開會時呈明總理察核」，「適用總理制處分」。¹¹⁶ 饒富意味的是，這兩件案子雖是總理「最後決定」的表現，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倒也顯示在國民黨領導制度轉型的初期，黨中央的委員們相信「本黨總理制時代」已隨改組而結束的事實。

2. 一般情況

總體而言，雖然有些地方、海外幹部不易立即擺脫黨的舊式文化制約，仍以直接上書或轉呈的方式，請求孫中山開革某些違紀黨員的黨籍，然而也有不少幹部體察到前述「黨力」新生的現象，能將中執會視為另一決獄之場域。就實施黨紀懲戒的一般情況考察，總理多半不輕易凌躡委員們的法定職權。例如就在余、柏兩案同一期間，中監會仍能對另一黨員被控案做出「當無受理之必要」的具體決定，¹¹⁷ 也針對一些案子進行實質審查，由中執會做出具體處分決議。¹¹⁸

¹¹⁶ 柏文蔚遭到候補中執委張秋白等7人彈劾，以及劉培壽等168名自稱「安徽逃亡黨員」的揭告，據稱涉及誹謗總理及叛黨、親附唐繼堯和章太炎等聯省自治派之言行。指控人也認為柏必須為安徽「黨務之壞」負起責任。〈劉培壽致中央執行委員會代電〉（1924年4月10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2209.1；〈柏文蔚致孫中山呈〉（1924年4月19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2141.3；〈中央監察委員會致中央執行委員會函〉（1924年4月21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2209.2；〈中央監察委員會致中央執行委員會函〉（1924年5月4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2141.5。4月28日，孫中山在中執會會議上問柏對於聯省自治的態度，得否認之答覆後，表示滿意，裁定柏案了結：《一屆中執會紀錄》，頁53-54。相似的例子：〈中央監察委員會審查墨支部函請革除余毓緒黨籍案公函〉（1924年4月17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53。至於7月張秋白等人開復黨職黨權案因與柏案處理程序配套，故仍呈請總理決定。

¹¹⁷ 〈曾桂芬上中執會呈〉（1924年2月28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6604；〈中監會致中執會公函〉（1924年4月18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3/3.3；第24次會議（1924年4月24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51、53。

¹¹⁸ 溫亞興案：〈萬里洞支部部長黃仲衡等上孫總理函〉（1924年3月20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2244.1；第27次會議（1924年5月

3. 國共關係

這部分的黨紀案攸關容共爭議，亦最是總理意向必欲貫徹的範疇，相形之下，中執、中監兩會的實質作為有限。至於孫中山雖然自居為容共政策的主導者，對其所謂「急進派」、「穩健派」兩造的「衝突、反目、抗爭」，常秉持「綜合派」的調和立場，時見總理特權介入的斧鑿痕跡，惟表現形式仍然曲折。¹¹⁹ 例如一全大會閉幕後，曾有黨員集議，警告李大釗等跨黨分子不得攘奪黨統，鮑羅廷頗表憤懣。孫中山聞訊，責謝英伯等4名為首者破壞紀律，「擬革除」黨籍，卻又著當事人於2月16日赴中執會第六次會議「自行辯護」。¹²⁰ 3月1日，孫手諭中執會，表示4人之解釋「本總理已甚滿足，此事當作了息，但望同志以後不得再起暗潮，如有懷疑，當來直問總理為是」。¹²¹ 整起事件中，孫中山能重申自己對容共爭議的最高仲裁地位，安撫了鮑的情緒，也不失技巧地引進中執會的角色作為處置的迴旋空間，甚至給了當事人一個下臺階。翌日，孫還少見的以個人名義通告黨員，再論聯俄、改組原因，力辟赤化謠言，仍是以國共關係為己任的權威語態。¹²²

8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59；〈中執會致萬里洞支部長黃仲衡等函〉（1924年5月19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12244.2。張澤榮案：〈陳耀垣上海外部函〉（1924年4月7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4759；〈中執會致中監會函〉（1924年5月11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8861；第29次會議（1924年5月19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62。此後更多的懲戒案例，參見〈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報告書〉（1925年12月29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1.6/1；《一屆中執會紀錄》，頁37、45、56、84、89、93、99、102、111。

¹¹⁹ 〈與某日人的談話〉（1924年2月），《國父全集》，第2冊，頁604。

¹²⁰ 當事人為謝英伯、徐清和、馮自由、劉成禺。綜見〈總理開除謝英伯等四人黨籍手令〉（1924年2月，不晚於15日），《一般史料》，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051/441.1；〈中執會致謝英伯等四人來會辯護通知〉（1924年2月15日），《一般史料》，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051/441.2。第一屆中執會會議紀錄並未載錄第六次會議的內容。關於當事人的自辯，參見鮑羅廷的報導：〈鮑羅廷筆記和報告記錄摘要〉（不早於1924年2月16日），頁362。

¹²¹ 〈總理手諭抄件〉（1924年3月2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0092；〈中執會致劉成禺馮自由等人函稿〉（1924年3月3日），同檔號。

¹²² 〈釋本黨改組容共意義致黨員通告〉（1924年3月2日），《國父全集》，第2冊，頁140-142。

然而國共紛爭並未消失。隨著跨黨黨員投入國民黨事務愈趨廣泛深入，中共中央因勢提出「鞏固國民黨左翼和減殺右翼勢力」，以及強化共黨組織的內部指示。¹²³ 就在形勢的激盪之下，國民黨內的分共勢頭同樣高漲，檢舉跨黨分子者眾，其中尤以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於6月18日具狀彈劾全體跨黨黨員案掀起的波瀾最鉅，馴至催使中執會決議召開二中全會「妥籌解決」，蔚為學者所稱「黨內第一次反共護黨的浪潮」。¹²⁴

二中全會召開之前，無論在跨黨分子的「減殺右翼」，或是純粹國民黨員「反共護黨」的行動中，都有人嘗試爭取「孫大總理」、「中央執行委員會諸公」的同情視聽，促請「徹查」、「取締」、「制裁」。¹²⁵ 但也有人擔心複層權力空間任一方面態度無法滿足自己的主觀期待，於是只願意選擇性的催請總理行使特權，或期許中執會遂行其法理職能。例如有排共分子抗拒中執會裡的跨黨、友共委員參加分共大計的討論，主張逕由總理「毅然主持」、「當機獨斷」，摒逐共黨。¹²⁶ 至於鄧澤如等3監委則是依循總章的規定，將彈劾案提交中

¹²³ 〈此次擴大執行委員會之意義〉，與〈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1924年5月），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頁229-233；〈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書面報告〉（1924年6月2日），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1卷，頁397。

¹²⁴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年），頁526、532；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311-324。

¹²⁵ 跨黨黨員，例見：〈上海市一二五九區執委會致孫總理函〉（1924年8月13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9112；〈中央通告第十五號〉（1924年7月21日），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頁282；〈上海一區三分部致中執會電〉（1924年8月），《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9113。排共分子，例見：〈鄒德高等上中執會呈〉（1924年6月28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8989；〈程永言等上總理呈〉（1924年7月20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8990；〈京漢鐵路總工會上總理呈〉（1924年8月12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8999；〈京漢鐵路總工會上中執會呈〉（1924年8月12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9000；〈李秀然等上總理呈〉（1924年8月15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9004；〈李秀然等上中執會呈〉（1924年8月15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9003。

¹²⁶ 〈施承謨等上總理呈〉（1924年7月），《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8992；〈上海各區聯合大會呈總理代電〉（1924年8月1日），《中央第

執會，「希即從速嚴重處分」，一方面卻只是禮貌性的「備函」告知總理，請求「督促」中執會「從速嚴重處分」，所反映的正是一批中央委員未能滿意總理面對國共爭端時經常扮演的調和者角色，希望伸張中執會做為日常最高權力機關的法理職能。¹²⁷

從6月開始，3監委既在廣州的酬酢場合抒發黨是感懷，也在中執會的會議桌上掀起形勢逼人的清議。¹²⁸他們在中監會裡審查一些彈劾共黨案時總能投注認同，進而移請中執會從嚴處分，要求二中全會予以公決。¹²⁹對於孫中山而言，即便自有宸衷，但也能體察時勢，了解國共重大問題同樣需要透過一場中央全會，藉以形成組織約束效果的黨意。這樣，自8月15日開議的二中全會既湧現了近來的排共聲浪，也體現了孫以黨力為表、個力為裡，藉以平息容共爭議的主導思維模式。最終，全會決議接受中央政治委員會所提交的兩個草案，權充解決國共爭端的張本：一以國民黨的紀律約束共產分子；一在中政會下設置國際聯絡委員會，成員由總理任命，負責直接聯絡第三國際及各國革命組織，期能掌握第三國際、中共對國民黨有關的決議與行動。¹³⁰換言之，孫中山是透過自己主持且直接影響下的中政會，引導了中央全會的決議，又把執行權責送交中政會的手

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8993。

¹²⁷ 鄧澤如、張繼、謝持，〈致中央執行委員會書〉、〈呈總理文〉（1924年6月18日），收入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314-316。

¹²⁸ 邵元冲著，王仰清、許映湖標注，《邵元冲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924年6月9、19日；7月3、7日條，頁17、20、26、28；〈關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40次會議的報告〉（1924年7月3日），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1卷，頁398-402。

¹²⁹ 例見：〈中監會審查報告書〉（1924年8月13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9001；〈中監會審查提案書第六十號〉（1924年8月16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9005；〈中監會審查提案書第六十一號〉（1924年8月16日），《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漢9006。

¹³⁰ 第6次會議（1924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一至一百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00.1/29。全會討論兩草案時的發言內容：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328-330；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編，頁535-538；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年），1924年8月13、20-21日繫事，頁1513、1518。國際聯絡委員會最終沒有成立。

中。考慮到中政會附麗於總理特權的性格，其實案子還是曲折地回到總理訓育的層次消納解決了。

三、中政會的角色

討論總理與中執會的關係，需要注意中政會做為一個變項的角色。中政會設置於1924年7月，起初沒有正式的組織法源依據，實際是由孫中山自任主席，並指派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邵元冲、譚平山（未就，嗣以瞿秋白補實）為委員，伍朝樞為祕書，聘鮑羅廷為高等顧問，形同總理直領下的幕僚單位。11日，中政會舉行第一次會議。¹³¹ 3天後，中執會討論胡漢民所提中政會之權限案，決議：「一、關於黨事，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按照性質由事前報告，或事後請求追認；二、關於政治及外交問題，由總理或大元帥決定辦理。」¹³² 准此以觀，中政會不只分享了中執會的同一主席和其中的5位委員，議事範圍似乎也比中執會來得廣，甚至能夠涵蓋「黨事」，不免令人對總理、中政會、中執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感到好奇。

中政會是鮑羅廷向孫中山進言後的產物，既與中央執行委員人數過多而欲尋求決策機轉之精煉化有關，其設置的時間點正逢「第一次反共護黨」浪潮高漲期間，因此也有學者相信是出自鮑某種「隱諱的考慮」，亦即想將中執、中監兩會的權力移轉過來，讓孫中山擺脫一干「老同志」的影響。¹³³ 此說按以鮑羅廷的幾次言論，差堪不誤。例如鮑在6月25日與謝持、張繼的談話中，不只反駁對方對於跨黨黨員忠誠度的詰問，同時指責中執會有「許多右派分子加雜其中」，實際上不能承擔「黨之中心」；約莫同時，鮑的情態快然，意氣頗烈，甚至一度告訴加拉罕，有意向國民黨發動某種「決定性攻擊」云云。¹³⁴ 不旋踵間，適有鮑

¹³¹ 中政會成員名單：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36-37。中政會首次會議：第1次會議（1924年7月11日），〈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一至一百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00.1/29。

¹³² 第43次會議（1924年7月14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85。

¹³³ 王奇生，〈中政會與國民黨最高權力的輪替〉，頁65。

¹³⁴ 〈謝張兩監察委員與鮑羅廷問答紀要〉，收入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325；〈加拉罕致鮑羅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

羅廷所說的「由所謂『左派』組成了政治委員會」一事產生。若就政治的幽微面向探求，恐怕是和這位俄國顧問的「中心」思慮、「攻擊」念頭不能無關的。¹³⁵

當然，鮑羅廷所稱「左派」一節是夸夸其言的，其實剛組成的中政會裡並未存在全持左派觀點的純粹國民黨員；¹³⁶ 惟從鮑「隱諱的」思考再行思考，益可反襯之前的中執會並非毫無權力可言。應該說明的是，其後鮑的權力移轉意圖雖然呈現了緩步進展的徵候，但至少在孫中山11月北上，甚至翌年1月下旬入北京協和醫院施行手術之前，並未真正得到突破性的表現。以中政會討論的黨事問題為例，根據孫北上前的12次會議紀錄觀察，其實議及不多，尚難說是已將黨事的權力移轉過來。¹³⁷ 只是中政會在處理這些案子時，似有若干「自行其是」的跡象：既沒有在「事前報告」中執會，甚至也有案子未在「事後請求追認」，很難說是充分實現了「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的精神。¹³⁸

和俄共組成中央政治局的經驗相似，國民黨中政會同樣也是為了政治指導下的事實需要而成立的。¹³⁹ 關於這一點，鮑羅廷確曾埋怨中執會沒有辦法充分回應北方的全國性重大事件，復又宣稱中政會「將要對所有的政治問題發表聲明和

中國》，第1卷，頁412。

¹³⁵ 〈鮑羅廷致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1卷，頁418-419。

¹³⁶ 鮑自己也說伍朝樞有「迎合帝國主義的口味」的某些表示。〈鮑羅廷致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頁419。陳獨秀甚至認為孫中山和國民黨幾位領導人充其量只能算是中派。〈陳獨秀致魏金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1卷，頁415。

¹³⁷ 除了提交二中共全會的國共關係二草案之外，大約就是「各地方黨部非有特別工作，中央概不津貼經費」、「中央執行委員會實業部改為商人部」、「廣州《民國日報》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管理」等。又，學者劉維開討論中政會組織及與中執會關係時，也提到中政會成立後「關於黨務之議決案甚少」的事實。劉維開，〈訓政前期的黨政關係（1928-1937）——以中央政治會議為中心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4期（2005年11月），頁89-90。

¹³⁸ 綜見第1-12次會議（1924年7月11日-11月1日），〈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一至一百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00.1/29。

¹³⁹ 〈關於組織問題〉（1919年3月）、〈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章程〉（1919年12月），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1分冊，頁566、593；〈關於組織問題〉（1923年4月），同書，第2分冊，頁298。

決議」；¹⁴⁰ 根據汪精衛的回憶，也說國民黨「沒有政治指導機關」，必須求其完備。¹⁴¹ 其實國民黨改組後，黨政聯繫體制尚未充分發展成熟，中執會對於政令性質濃厚的事務一時缺乏直接指導施行的職能表現，所議決事項實際上仍賴孫中山（總理／大元帥）居間銜接。¹⁴² 及至中政會開議後，討論最多的正是政治、外交問題。也因為如此，有關中政會成立的最大意義，曾否侵奪了中執會這一塊本即薄弱的權力尚屬其次，毋寧更該放在國民黨從「治黨」到發展「黨治」機轉的較長時程裡考察：它托庇於總理直領的權威，並將孫以往處在國民黨和廣州政權之間做為政治指導的個人連繫角色進行了初步組織化（即委員會形式）的加工，使能成為黨內「唯一討論政治」並促使中執會和政府實行之「機關」，有助於建立日後黨政聯繫渠道之體制化的前提基礎。¹⁴³

陸、結論

國民黨治黨模式在改組期間經歷了「個力」未絕而「黨力」新生的重要轉型過程，形成總理特權與中執會合議之上下共構共轉的「複層權力空間」。這種混合體制的產生背景至少包括：第一、俄共委員制做為改組所想像的先進治黨模

¹⁴⁰ 〈謝張兩監察委員與鮑羅庭問答紀要〉，頁324-325；〈鮑羅廷致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頁419。

¹⁴¹ 汪精衛報告，〈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第2日第3號（1926年1月6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2.1/23。

¹⁴² 例見第2、4、37、38、49次會議（1924年2月1、9日；6月16、19日；8月7日），《一屆中執會紀錄》，頁3、9、73-74、76、92、95。

¹⁴³ 中政會曾決議「本會為唯一討論政治之機關，至於實行則一方由於政府，一方面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次會議（1924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一至一百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00.1/29。爾後，中政會開始進一步的體制化歷程。1925年6月，即國民政府成立前，中政會明訂自己設置在中執會裡的身分，並申明代表國民黨指導施政的性格。第14次會議（1925年6月14日）與第16次會議（1925年6月19日），見〈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一至一百次會議紀錄〉。1926年1月，二全大會修正總章，正式提供了中政會設置的法源依據。〈中國國民黨總章〉（1926年1月16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議決案》（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1926年），頁98。關於訓政初期中政會的角色與職能表現，詳見劉維開，〈訓政前期的黨政關係——以中央政治會議為中心的探討〉，頁85-130。

式，結合集體領導的形式、自下而上鍛造的嚴密組織體系，以及剛性紀律的行使，頗能符合孫中山強化黨基的設想；惟復按以共黨的實際運作經驗，則其委員合議往往又無從掩蓋強人意志的可能發揮，實則和國民黨的人治傳統之間存在著某種未必相斥的特質。第二、1924年1月國民黨一全大會通過的新總章雖然仿行俄共章程，突出了以委員制為主軸的一套金字塔型領導、組織體系特徵，但同時也藉由總理專章的設計，直接將孫和黨的總理職位連結固定，申明其思想的引導性格、對黨員的指導地位，以及對中執會議決事項的最後決定權，進一步在俄共章程之所無的法制效果上，建立強人訓育角色的嶄新正當性。

以往學者認為總理專章係出諸純粹國民黨員引為「防共」安全閥的設想，本文則願指出：專章其實是黨內各方基於現實需要與情境制約下的共同創作成果。鮑羅廷甫抵廣州，即已深明改組大計在各方意識紛陳的局面下萬萬「離不開」孫中山的大義，不僅尊崇孫在國民黨與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引航角色，也懂得在自己的委員制章程草案中為前述角色預留某種模糊的展布空間。做為改組工程的策動者，孫中山已能認同黨務「分之眾人」始可永固黨基的觀點，總是公開勸說黨員接受領導改制的，但他頗能洞澈「革命聖人」如列寧者之領導作用長在的事實經驗，寸衷既不以俄共委員制與國民黨「尊王」之風為互斥，其實已有兼行而駕乎俄人成績之上的浮想。此外，總理專章更是跨黨黨員、友共分子，乃至疑共、排共分子競以孫中山為支點而在合議格局下尋求最高仲裁、相互制衡的某種權力槓桿化想像，它自必在某些程度上帶有延續國民黨人治傳統的深刻意義，但就各方咸感需要的現實功能而言，著實見證了國共關係以「黨內合作」做為表現形式的不穩定性。

前述總理專章之所以形成的錯綜背景，決定了國民黨改組後至孫中山逝世前總理特權與委員合議互為相需的特殊形貌。孫的個力洵然居於中執會所象徵的黨力之上，卻也覺察於訓育／被訓育的相對身分，必須寓於同一空間內共同運轉，形成前此未曾多覩的混合體制。正如北方報界的敏銳觀察：孫晚年漸成黨內「最高之偶像」，然改組後權力之運用「並不在一人，而在一合議體之中山，則以其內部組織之故」。¹⁴⁴ 一全大會前與開議期間，黨內資深幹部曾擔心跨黨分子染

¹⁴⁴ 旨微，〈社論：中山死後一日〉，《益世報》，北京，1925年3月14日，版2。

指總理職位，又憂慮其藉由中執會的合議機制壯大，頗可說明二者均被視為來日要津的事實。以往學者強調國民黨改組後仍是總理獨斷獨行、獨裁的局面，卻往往忽略了孫面對委員合議機制時，常有相對克制的表現，在實證經驗上並未遺忘「分之眾人」的改組本衷。新創的總理「最後決定之權」在權力行使的位階上誠然高於委員合議，但孫的行使頻率尚稱自制，也幾乎能以委員合議結果做為程序基底再行使其可否態度，憑空頤指而逕成黨令之例少見。在一般黨務的決策方面，總理和委員合議之間則是顯示了錯綜、動態而未必規律的權力施作特徵，其間可見孫的意志流灌，尤以重要人事、國共關係事務與黨政聯繫為是；惟仍要透過中執會做為日常最高權力機關的新穎身分而為曲折表現。此外，在孫未必、不必籠罩一切的情況下，即便中執會斷非萬能，卻已有審處黨內事務、分配黨內資源的自主作為，且未必只算錙銖。

複層權力空間所指涉的是國民黨改組後至孫中山逝世前，寓強人訓育角色於集體治黨機制之內的新表現模式，其在黨史上具有關鍵的承轉意義：

第一、總理以往「代表本黨，總攬黨務」的全能全責傳統開始產生變化，即使連黨的中央委員也認知到純粹的總理制時代已經淡出。中執會不僅以一種新生的集體意象取代了從前總理一人對外代表國民黨的角色，也在孫中山猶不失其自制與優假之下，開始領導、執行相當程度的黨務，從中更透過與下級組織之間的權力互動，逐漸在國民黨改組後的組織文化中，明確其做為「中央」的整體身分，並積累成一種以黨的（而非個人的）支配權力做為指涉意義的「黨權」嶄新意識。

第二、個力與黨力基於相需而上下共治一爐，惟就權力行使的本質而言，畢竟仍不易改變其「相剋」色彩。俄共委員合議機制的運作原本就不容易脫逸「革命聖人」的實質影響力，此一治黨模式移植到國民黨後，強人的實質影響進而以訓育之名獲得制度面的正式認可，其與委員合議機制能否建立較為和諧穩定的共構共轉效果，只能依賴各自相需動機和自制表現之升沉而定，實則不能改變兩極易於相剋的本質。根據本文的討論，國共關係是孫中山在複層權力空間中最欲貫徹個人意向的範疇之一，然1924年夏天，國民黨內對於是否繼續容共的爭執愈演愈烈，孫中山做為國共問題的最高仲裁人，即使胸有定見，仍不能不召開一場中

執會全體會議，藉以宣示黨的立場；另一方面，國共關係原本是黨內各路勢力公允形成總理特權的重要背景，然而一批分共意識強烈的委員漸已不滿孫慣於調和國共的作風，遂欲繞過既往引為必需的總理特權，反要勉力伸張中執會做為最高權力機關的法理職能。整體看來，8月舉行的二中全會承載了不同人等的政治需求，然而當會場上愈發軒昂的分共言論衝擊了孫中山所設想的秩序時，其不僅透過新設中政會所提供的辦法引導全會採行，也在情緒上不能自己地嘗試喚起在場委員對於中華革命黨時期「附從孫先生」及黨魁「統一一切」的記憶。¹⁴⁵類似的史實呈現了國民黨領導制度轉型的人為斧鑿痕跡，終究也在結構的意義上，見證了委員合議機制與政治強人相處時，難以完全超克的內在侷限。無可諱言地，這既是複層權力空間的又一內在特徵，也預示了個力與黨力兩種權威在後孫時代仍要競逐頡頏的命運。

¹⁴⁵ 〈孫中山在國民黨最後一次中央全會上的講話〉（1924年8月30日），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1卷，頁433。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一般史料》（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上海執行部提出江蘇臨時省黨部變更預算案〉（1924年6月9日）。

〈中國國民黨軍隊黨團組織通則〉（1924年3月5日）。

〈中執會上總理請為軍校教導團指定撥款機關呈〉（1924年9月18日）。

〈中執會致謝英伯等四人來會辯護通知〉（1924年2月15日）。

〈吳鐵城致張繼函〉（1943年5月14日）。

〈國民黨改組計畫〉（不早於1923年10月18日，不晚於25日）。

〈國民黨改組計畫圖式〉（不早於1923年10月18日，不晚於25日）。

〈總理任廖仲愷黃居素許崇智蔣中正等為部長秘書手令〉（1924年11月11日）。

〈總理開除謝英伯等四人黨籍手令〉（1924年2月，不晚於15日）。

《中央前五部檔》（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中央青年部上中執會報告稿〉（1924年4月8日）。

《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上海一區三分部致中執會電〉（1924年8月）。

〈上海市一二五九區執委會致孫總理函〉（1924年8月13日）。

〈上海各區聯合大會呈總理代電〉（1924年8月1日）。

〈上海執行部上中執會電〉（1924年5月30日）。

〈大本營秘書處致中執會函〉（1924年6月28日）。

〈大本營秘書處致中執會函〉（1924年8月22日）。

〈中央秘書處上總理呈〉（1924年8月2日）。

〈中央秘書處上總理呈稿〉（1924年8月17日）。

〈中央秘書處致林祖涵同志函稿〉（1924年7月1日）。

〈中央秘書處致黃居素函稿〉（1924年10月9日）。

〈中央秘書處致廖仲愷函稿〉（1924年11月11日）。

〈中央秘書處復廣州特別市黨部函稿〉（1924年7月18日）。

- 〈中央監察委員會致中央執行委員會函〉（1924年4月21日）。
- 〈中央監察委員會致中央執行委員會函〉（1924年5月4日）。
- 〈中執會呈總理文〉（1924年8月8日）。
- 〈中執會致中監會函〉（1924年5月11日）。
- 〈中執會致費哲民函〉（1924年4月26日）。
- 〈中執會致萬里洞支部長黃仲衡等函〉（1924年5月19日）。
- 〈中執會致廖汪戴邵劉五同志函稿〉（1924年7月18日）。
- 〈中執會致劉成禺馮自由等人函稿〉（1924年3月3日）。
- 〈中執會通告〉（1924年3月16日）。
- 〈中監會審查報告書〉（1924年8月13日）。
- 〈中監會審查提案書第六十號〉（1924年8月16日）。
- 〈中監會審查提案書第六十一號〉（1924年8月16日）。
- 〈本黨改組特別會議錄〉（1923年10月25日）。
- 〈李秀然等上中執會呈〉（1924年8月15日）。
- 〈李秀然等上總理呈〉（1924年8月15日）。
- 〈李章達致中執會函〉（1924年9月10日）。
- 〈李章達致中執會函〉（1924年9月16日）。
- 〈汪精衛致中執會函〉（1924年10月2日）。
- 〈京漢鐵路總工會上中執會呈〉（1924年8月12日）。
- 〈京漢鐵路總工會上總理呈〉（1924年8月12日）。
- 〈施承謨等上總理呈〉（1924年7月）。
- 〈柏文蔚致孫中山呈〉（1924年4月19日）。
- 〈張知本上中執會提案〉（1924年6月25日）。
- 〈陳耀垣上海外部函〉（1924年4月7日）。
- 〈曾桂芬上中執會呈〉（1924年2月28日）。
- 〈程永言等上總理呈〉（1924年7月20日）。
- 〈覃振上中執會呈〉（1924年6月17日）。
- 〈黃發文上中執會呈〉（1924年5月1日）。
- 〈萬里洞支部部長黃仲衡等上孫總理函〉（1924年3月20日）。
- 〈鄒德高等上中執會呈〉（1924年6月28日）。
- 〈劉培壽致中央執行委員會代電〉（1924年4月10日）。
- 〈劉爾崧致中執會函〉（1924年5月18日）。
- 〈劉奮翹致青年部長鄒魯函〉（1924年5月）。

- 〈廣州特別市執委會致中執會函〉（1924年7月8日）。
- 〈總理手諭抄件〉（1924年3月2日）。
- 《會議紀錄》（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 〈一屆中執會第一～一三一次會議紀錄〉（1924-1925年）。
- 〈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一至一百次會議紀錄〉（1924-1925年）。
-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1924年1月）。
-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1926年1月）。
- 〈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1923年10月-1924年1月）。
- 〈中監會致中執會公函〉（1924年4月18日）。
- 〈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報告書〉（1925年12月29日）。
- 中央委員會祕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臺北：編者，1954年。
- 中央執行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議決案》。廣州：編者，1926年。
- 中央執行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決議案》。廣州：編者，1924年。
-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1、2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編，《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 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四川省中共黨史研究會編譯，《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1919-1927》，第1輯。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
- 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1卷。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
- 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政治部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經過概略及各種重要報告》。未著出版地：編者，1926年。
-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5、8輯。臺中：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54-1955年。

二、日記、文集與憶述文獻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編，《鄧公澤如逝世一週年紀念專刊》。廣州：編者，1935年。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民國日報社編，《中國國民黨改組紀念——民國日報特刊》。上海：編者，1924年。

吳鐵城，《吳鐵城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

李宗黃，《李宗黃回憶錄——八十三年奮鬥史》，第3冊。臺北：中國地方自治學會，1972年。

阮嘯仙文集編輯組編，《阮嘯仙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

亞·伊·切列潘諾夫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尚明軒、余炎光編，《雙清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邵元冲著，王仰清、許映湖標注，《邵元冲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徐永瑛，〈見孫中山先生記〉（1924年2月9日採訪），《近代史資料》，總68號（1988年1月）。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2、3、5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

黃季陸，《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憶》。臺北：國史館，1978年。

鄒魯，《回顧錄》，第1冊。南京：獨立出版社，1947年。

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上海：正中書局，1948年。

三、期刊、報紙

《中山日報》海外版，中山，2011年。

《中央半月刊》，南京，1927年。

《民國日報》，廣州，1923-1924年。

《申報》，上海，1923年。

《東方雜誌》，上海，1922年。

《前鋒》，廣州，1923年。

《益世報》，北京，1925年。

《嚮導》，廣州，1923年。

四、專書

王奇生，《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1924-192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列·達·托洛茨基著，王家華、張海濱譯，《論列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

李玉貞，《孫中山與共產國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李宗黃，《中國國民黨史》。上海：民智書局，1928年。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年。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年。

周永祥，《瞿秋白年譜新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年。

崔之清主編，《國民黨政治與社會結構之演變（1905-194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深町英夫，《近代廣東的政黨·社會·國家——中國國民黨及其黨國體制的形成過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陳三井，《舵手與菁英——近現代中國史研究論叢》。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8年。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鄒魯編，《中國國民黨史稿》。上海：民智書局，1929年。

- 鄒魯編著，《中國國民黨史稿》。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
- 頓斯科依著，俊莊譯，《蘇聯共產黨的列寧組織原則》。北京：時代出版社，1955年。
- 蔡洛等，《彭湃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 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上海：明東書局，1925年。
-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年。
- Bergère, Marie-Claire. *Sun Yat-sen*. trans. by Janet Lloy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Fischer, Louis. *The Life of Leni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 Jacobs, Dan N.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Saich, Tony.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Leiden: E.J. Brill, 1991.

五、專書論文、期刊論文

- 王正華，〈國民政府初創時之組織及黨政關係（民國14年7月至15年12月）〉，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7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 王奇生，〈中政會與國民黨最高權力的輪替（1924-1927）〉，《歷史研究》，2008年第3期（2008年6月）。
- 王奇生，〈國民黨中央委員的權力嬗蛻與派系競逐〉，《歷史研究》，2003年第5期（2003年10月）。
- 王麗華，〈國外列寧研究中的不同觀點〉，《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年第6期（2005年）。
- 江田憲治，〈一九二〇年代の民主主義——国民党と共産党を中心に〉，收入狹間直樹編，《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
- 李慶剛，〈彭湃出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秘書有關問題考辨〉，《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6期（2007年11月）。
- 韋慕庭，〈孫中山的蘇聯顧問，1920-19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987年6月）。

敖光旭，〈失衡的外交——國民黨與中俄交涉（1922-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

曾成貴，〈中國國民黨漢口執行部解析〉，《民國檔案》，2009年第4期（2009年11月）。

瑪瑪耶娃撰，孫艷玲譯，〈共產國際與國民黨——20世紀20年代關於共產國際與國民黨相互關係的某些觀點〉，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

劉維開，〈訓政前期的黨政關係（1928-1937）——以中央政治會議為中心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4期（2005年11月）。

蔣永敬，〈孫中山與鮑羅廷〉，《近代中國》，第157期（2004年6月）。

蔣永敬，〈鮑羅廷與中國國民黨之改組〉，收入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3冊。臺北：編者，1981年。

鮑焱，〈一江風浪縱虛舟——著名國民黨左派彭素民紀事〉，《黨史文苑》，2005年第17期（2005年9月）。

六、工具書

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年。

七、未出版學位論文

李雅芬，〈從翰林革命家到激進左派——徐謙的重要政治生涯（1903-1927）〉。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